



2010 年 3 月 15 日第 4 期

总第四十四期

2008 年 9 月 13 日创刊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

本期目录

乱世民情

[戴为伟 快乐琴和爸爸探亲](#)

[严正学 路漫漫（节选）](#)

简讯

[舟 人 有关内蒙文革的两本书出版](#)

书评与序跋

[沈迈克 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

[徐友渔 民族的不幸源于政治的不幸](#)

[何 蜀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闲读偶记

[邵燕祥 因因果果——读书札记一则](#)

[胡 泊 无语对长城](#)

一瓣心香

[启 之 纵无健笔书青史，不敢心声付蛀尘——悼《记忆》之友刘向宏](#)

史林一页

[陈益南 《毛泽东视察湖南的指示》与“省无联”的命运](#)

故纸堆

[毛泽东视察湖南的指示](#)

[阎长贵辑录 文革中权威人士谈王、关、戚事件](#)

小资料

[顾训中 关于张本](#)

专访

[本刊记者 再访作曲家施万春教授](#)

文摘

[孙传钊 受害者同时是加害者](#)

编读往来

一、[唐金鹤答刘双](#) 二、[杜钧福订正刘双](#) 三、[张杰来信置疑](#)

四、[戴为伟谈读后感](#) 五、[赵晓玲赞华新民之文](#) 六、[胡泊纠错](#)

【乱世民情】

[快乐琴和爸爸探亲](#)

[戴为伟](#)

1972 年，久无音信的姨姥姥给妈写了信，大意是踟躅在五七干校的人们有了返城的松动，她们一家有望返回惜别三年的北京。

不久，姨姥姥先回来了，住在我家十平米的斗室里。她这回对我异常亲切，还带我上了趟西单，扯了块灰白竖条底、大红牡丹花的洋布，让妈给我做衣裳。

西单西南角有一家熟肉铺，就是现在北京著名的天福号。那天晚上，姨姥姥还从那儿买回了半斤酱肉。那切得薄厚均匀的一片片酱肉，肥多瘦少，每片都连着一层诱人的枣红色肉皮，放一片在热米饭上，很快肥肉就显出些半透明的样子，肉皮变得软糯香滑。那时候，天福号卖酱肉的习惯是把好看的肉皮和厚厚的肥膘露在上面，瘦肉藏在下面。人们大多爱吃肥肉。

那晚，姨姥姥、妈还有我谁也舍不得多动筷子，可肉还是很快就吃光了。从那以后，直到 1978 年爸（注：戴煌，1957 年在新华社被打成“右派”）从山西“劳改营”回来，我时常缅怀那种酱肉的香味。

姨姥姥总在和妈嘀咕着户口、小姨什么的。两天后，姨姥姥回干校去了。妈开始跑派出所。

开春的时候，姨姥姥的闺女，我的小表姨从干校回来，落户到我家。

小表姨上初二了，她带来一只天蓝色的快乐琴。那琴约有二尺长，五寸来宽，琴分上下二层，下层是一寸高的空木盒子，在右手侧，距木盒边三四寸的地方开了一个圆洞，大概起音箱的作用。在这洞上面与木盒同长是一粗三细四根钢丝琴弦，琴的上层是一寸来宽，1公分厚的一块木板，夹在木板与下层音箱之间二十几个铁制的小琴键参差地排在琴弦上。琴盒的背面有个小塑料袋，叉着三片大杏仁形状的白塑料片，用右手拿塑料片拨动琴弦，左手按不同的琴键，能奏出一个简单的曲子。

小表姨会弹拨几个曲子，我只会弹音阶。每一拨动琴弦，那蓝色的小琴就会发出清脆的弦乐声。

那时候孩子们的玩具不多。我很羡慕学校里一些孩子拉手风琴、弹风琴的样子。每到五一、十一、儿童节，他们就会在学校临时搭建起的小舞台上，很神气地给大家表演一个什么曲子。这时我就特渴望自己也能有把琴之类的乐器。

半年过去了，姨姥姥回来安家，接走了小表姨。她们临走时把快乐琴留给了我。那是一个穷孩子确实得到的一个真实的快乐。

每年，从爸爸春节后离开北京的那一天起，妈就开始准备爸第二年回来探亲时需要的钱，再变着法儿换一些全国通用粮票，等爸一年后再带回山西“劳改营”用。那时，每30斤通用粮票含着半斤食用油票。妈每换回一些通用粮票，想到爸又能多吃些油，就会高兴一阵子。

在“劳改营”就业的爸每年只在春节期间有15天的探亲假。这15天没有工资，仅仅允许劳改就业人员休假，与家人团聚。这也许是那个年头仅存的一点人道主义了吧。

这年，爸又要从太原的“劳改营”回家来度一年一次的探亲假。

通常，爸会给妈写信，告诉我们他回来的大概日期。那时候，电话、通讯都特不发达，我们这条街上，只有胡同中间居委会治保主任家有一部公用电话。家里外出的人有磨不开的事才会往治保主任家打传呼电话。电话铃一响，治保主任先接，问清哪院、找谁、什么事，然后踮着半大的解放小脚去叫人。电话线另一头打电话的人得有比较好的耐心，举着电话等。

快春节了，这一日早晨不到5点，妈推醒我，让我锁好家门，就急匆匆上早

班去了。

天那么黑，那么冷，四合院里静极了，只听到我家那 8 瓦日光灯的整流器发出的嗡嗡声。我刚锁好门不久，就有人敲门，我小心掀开窗帘一角，门玻璃前是个黑黑高高的人影，带着棉帽子，身上扛着一堆很重的东西。

正迟疑着想再看看清楚，门外的人开口了：“为伟，开门，是爸爸。”

爸回来啦！我连忙拿钥匙打开反锁着的铁锁，再拉开门栓，爸卷着一身寒气进了我们 10 个平米的小家。他放下大包小包，并没有和我说什么，一脸不太高兴，坐到了床上。

我想到妈才出门不久，就嗫嚅着问：“爸——你看到妈妈了吗？”从很小起，我每年只能见到爸几天。有时在爸回来时，我竟有些面对生人的不知所措，尽管心里一直思念着自己的父亲，但当爸就在面前时却又会感到很生疏。这是一直与父母一同生活的孩子很难理解的一种奇怪的感觉。

“嗯”，爸瓮声瓮气地应了一声，算是回答了我，接着他疲惫地倒头睡在床上。

上午爸醒后，填了个报临时户口的小表格让我赶紧送到街道居委会去。我对办这事已经熟门熟路了。

街道居委会门口墙上挂着个一尺高、半尺宽的小木盒子，盒子正面是扇小门，锁着。小门上半部张个小口子，可以往里投个纸条之类的，小口子下面写着“临时户口簿”。我到居委会，踮起脚，把爸的临时户口申报条塞进这个小木盒里。

那时候，外地来京人员有正当理由的，如探亲、看病、出差，都要有所在单位或户口地派出所盖了公章的介绍信。北京——首善之区，不是谁想来就能来的地方！特别是地、富、反、坏、右大都被轰出北京，撵回老家了。大约不这样真是不足以保证红色政权的稳定和中央首长们的安全吧。

报临时户口是来北京的人一进家门必须首先办的一件大事！如果查出哪家临时来人没办登记，那派出所和街道居委会可以立马抓你走人。

中午，和爸、妹在家吃饭，尽管爸对我和妹问这问那，可我还是感觉到爸不太高兴。

下午 3 点，妈下早班回来了，拉门进屋，爸绷着脸。

“妈——，爸回……”我兴高采烈地转向妈。妈打断了我，似乎朝着我说：

“嗯，早上我看见你爸啦……”可眼睛分明瞅着爸：“为伟，你说说，你爸生我气呢。那么早，胡同里一个人没有，”妈有点自言自语的样子：“胡同里那么黑，大冬天的，老远就看见一个背着大包小包的，手里还拄着棍子，朝我这边来，我可不是得赶紧躲。结果我越怕，这人还越往我跟前凑，都凑到脸跟前了，也不说话！大帽子扣在脑门上，裹那么严，我真没看出是你爸！等你爸叫我，我才缓过神来。我唔唔两声，都快迟到了，迟到一次，这月2块钱的附加工资就没了。我跟你爸说话了，谁说我没理他，我说：‘快回去吧，为伟在家，我得走了，快迟到了。’瞅你爸那样，你说他对吗？！”

“一开始，我确实吓了一跳，真没认出是你爸。”妈又添了一句。

“那我怎么老远认出你了？哼，你妈变心哩……”爸依旧有些不服气的样子，可脸色已经缓和多了。

妈打开炉子，添了块蜂窝煤，烧上一壶开水，火旺起来，屋里暖和多了。

那些年，妈每月拿30块钱工资，如果一个月没有病假、事假，不迟到、早退，能多2块钱附加工资。可我，还有3岁的妹，经常生病，妈很多时候拿不到这钱。而每月妈多挣2块钱，对我们家实在太重要了。

这天晚上，一家人围着马粪纸板钉成的小饭桌，乐融融地吃过饭，爸开始抖搂他背回来的大包小包。

爸先把早晨吓了妈一跳的木棍给了我，那是一条车得很直的红缨枪。白蜡木做的，上端的木头车出一个很标准的梭标枪头，只可惜没配红缨子，枪显得秃了些。“女孩子，你给她弄这个干什么？”妈有些嗔怪爸爸。

爸又从包里掏出个一面嵌着块小圆玻璃的小木头盒。那木盒漆成棕色，上面弧形顶，前面嵌着玻璃，后面有块木板，从刻出的槽里能往上提，拉开这个小门。爸说：“你们瞧，这是我用一块整木头一下一下挖出来的。”爸比划着挖木头的样子，有些显摆自己木匠手艺的意思：“装咱家的闹钟用。”那钟表盒下端还刻出四条又短又粗的腿，整个小木盒粗笨的样子，灰头土脸的颜色，真说不上有什么好看，可妈却喜滋滋地抓过来端详了好一会儿。

爸在“劳改营”是木工，据他自己说是三级木工，但他亲手给家里做的八仙桌总是摇摇晃晃的，多年后终于被弃之不用了。

爸又从包里掏出一个黑乎乎的纸包，虽然刚吃好晚饭，可我和妹还是马上条

件反射，小饿狼般紧紧盯上了那个纸包。

昏暗的 8 瓦灯光下，爸粗笨的手指小心地解着粗糙的黄草纸包上的牛皮纸绳，打开，露出一层蜡纸，再打开，十几个粘乎乎马粪蛋大小的点心上裹着密密一层白芝麻。爸拿起一只先给了妹，又给了我。咬一口，真甜，还能拉出蜜糖丝呢。爸笑呵呵地看着俩女儿：“这是我信上老跟你们提起的阎伯伯，他特地给你们姐俩的。闻喜煮饼是山西的特产，山西呀有个县叫闻喜县……”爸还说话呢，我和妹手里的点心已经下肚了。再看马粪纸板的小饭桌上，妈麻利地用一只旧得都看不出原来印花的马口铁盒把剩下的点心装起来，放到高高的破皮箱顶上：“尝尝就行啦，不能没完没了的，留着春节……”妈早就看透了两个小孩儿的心思。

爸变戏法似的又从破旅行袋里拎出两个洗得发白的布袋，边说边打开：“这包是徐叔叔给的，”一看是核桃，“这是山西大枣，也是阎伯伯给的，你们都得记住这些叔叔、伯伯！爸爸在山西，平时多亏了他们帮助。这枣给你妈煮水能补血。你妈得补补了，这些年身体太亏了……”

妈打断了爸的话，小声和爸商量起来：“我看，是不是给北屋的佟大妈送点去，她在街道上……”妈的声音更小了。

妈从破碗橱里拿出我们平时吃面条和盛菜时用的大号搪瓷碗，盛了一碗，拉抽屉似的从碗尖上拿下俩枣，犹豫着又放上仨核桃，添上仨枣。“小为，”爸妈迟疑了一下：“去，给佟大妈家送去。”说着妈掀开门上的布帘往外看了看。

冬天的晚上，院里好多邻居都早早拉上了窗帘，可巧佟家还没拉帘。透过北屋大玻璃窗，外间就佟大爷一人在看报纸。“快去，现在院里没人！”

“我不去……”我小声嘟囔说。为什么不去呢？是因为佟家大妈平时看我的那副扬着眉毛垂着眼皮的怪模样，让我别扭。

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每年五一、六一、七一和十一国庆节，学校都要开庆祝会。会上的第一项内容一定是为那些加入红小兵组织的小学生举行庄严的入队仪式。被批准入队的孩子们穿着白衬衫、蓝裤子站在台上，由红小兵大队的领导宣布批准名单，再由各班选出的红小兵代表上台，为这些孩子佩戴红领巾。戴上红领巾的孩子都会感到很光荣。那时我们班的学生几乎都带上红领巾了，而我却因为“家庭出身”无法得到这份光荣。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佟家无论大人、孩子平时都很少和我们搭话。只有一次特例——妈不知从哪弄来一条新

的缺了一角的红领巾，塞在碎布包里，准备打补丁用。一天，我翻出那条红领巾，偷偷摸摸系在脖子上，在屋里照了会儿小镜子，憧憬着自己当上红小兵的样子。

那天下午，我在院子里玩，佟大妈破天荒地到我跟前，几乎还笑了笑，问我：“老师批准你当红小兵啦？！”“没有呀？”我疑惑地抬起脸，心想，我真是表现好了，连邻居街道积极分子大妈都以为我是红小兵了呢。我正喜滋滋，佟大妈脸上那副惯有的怪模样飞快遮住了刚才隐约的笑意，径直往外院去了。我猜想，一定是佟大妈看见我在自家屋里戴红领巾了。

我还犹豫在对“红领巾”的回闪中，妈突然打了我胳膊一下，“快去，死丫头，现在院里没人，听见没有？”爸脸上也略浮上一丝不快。我只好硬着头皮，端着那冒尖的一大碗核桃红枣，贼样地奔了北屋。八九岁的孩子不懂什么敲门，拉门进去，佟大爷从老花眼镜框上边翻眼看我来，不自主地站起来，“你这是……？”佟大爷有要拦住我的意思，可我比他动作快，已经把枣倒在八仙桌上了：“我爸妈让给你们家的。”“别……不要……”我不再听佟大爷说什么，猴一样窜出佟家，如释重负似地颠儿回了家。爸拍了下我的头，妈接过碗，捧一把核桃、枣又在往碗里装着。突然，有人敲门了。

妈连忙把小桌上的土产用布袋子遮了遮，嘴里应着“来了”，开了门。门外台阶下1米多远站着北屋佟大爷，手里报纸托着我刚送过去的大枣核桃，板着脸：“别这样，我们都能理解，都……那什么，拿回去吧。”佟大爷语气很和缓，定格在那里，看着自己手里捧的东西，再没有其他的话。爸尴尬地笑着，接过那捧报纸，佟大爷马上走了。

关上屋门，爸、妈沉默了得有一分钟，默默地收拾起那些红枣、核桃，全家上床准备休息了。

伴着爸妈小声说话声，我很快睡着了……

笃笃笃，笃笃笃，急促有力的敲门声吵醒了我。

“开门，开门，快点儿，查户口了！”门外一片嘈杂，手电筒的灯光不时划过黑黑的屋子，北屋、东屋的灯陆续亮了，灯光印在我家屋里墙上。妈开了灯，边穿棉袄边趿着鞋拉开了门栓，爸跟着也起来到了门口。门被屋外的人扯开了，寒冷的西北风随着大敞的房门一下子涌满了我们的小南屋，我赶紧掖掖自己的被子，往门口看去时，两只手电筒齐刷刷在爸妈的脸上晃来晃去，妈用手遮着眼，

拿出户口本和爸探亲的介绍信。门口黑黢黢的好几个人影晃动着，从妈手里接户口本的是个警察。这时又有一柱手电光照到屋里，还在我脸上晃了一下，又往下晃去，大概是要看清床底下藏了什么人不没有。

“住多少天？”

“15 天。”

“嗯。”警察往小本上记了什么，把户口本还给了妈。

终于门关上了，查户口的人们没去别的邻居家。

“得，怪冷的，您就先回吧。”那是刚才那个警察的声音。

北屋佟大妈搭言儿了：“那你们慢点啊，我不送了。”

各屋陆续关了灯，人们重又沉浸在黑黑的夜里。

这个春节，不知为什么，街道上来查了三回户口。每次都是深夜敲门，每次院里新回来了外地探亲的人时，查那家时总会捎带上再查我家一回。

每年爸回家探亲前，我和妈、妹一起盼呀盼，可从爸回来那天起，与爸的再一次分别就开始倒计时了。

春节很快过去了，爸已经去火车站排队买返回太原的火车票了。晚上妈下班，爸告诉她车票是两天后晚上 10 点半的，家里的空气一下子凝重了许多。

第二天，爸开始忙开了。妈拿出平日计算着买的肉票和攒了一年的钱、全国通用粮票，给了爸。又拿出北京市的面票给爸去买挂面。爸买回肥肉炼了好些大油，冻在大号搪瓷缸子里，准备带回“劳改营”分给那里的难友，还切了许多肉丁和着熬剩的猪油渣做了好些肉炸酱。临走的前一天，爸领我和妹上街买了些纸盒装的北京果脯，看到我和妹眼巴巴咽口水的样子，爸犹豫了一下，给我们小姐俩也买了半斤散装的果脯。

爸提着买的吃食一路走一路说：“为伟，你大了，懂事了，这些是给山西的叔叔伯伯们带的。太原街上商店里什么也没有，我每次回北京，他们都争着给你妈、你们姐儿俩带东西，爸一年在山西，他们经常照顾，经常请爸爸去他们家里吃饭。他们平时都吃高粱米、玉米面，那东西吃多了屎都拉不出来，爸爸给他们带些吃的、有油水的东西。人要有良心呐，孩子。”

爸要回太原了。这天，妈请了半天假回来帮爸收拾行李。屋里谁也不说话，连 3 岁的妹也老老实实在小板凳上不声不响。晚饭大家都没心思吃，不到 6

点，一家人就都呆坐在床沿上，看着地上的几包行李发愣。院里各家开门关门、炒菜、水池子上水龙头放水的声音似乎那么远，又那么清晰。

7点多钟了，离爸去火车站的时间更近了，院子里也静了许多，只有北风刮着干树枝呜呜地怪响着。

爸试图让全家高兴起来，他好像没看到我们要落泪的样子，拿出两个核桃，“来，为伟，爸爸给你们变个戏法，倏——”爸爸嘴里发出一声，好像核桃飞到窗外去了。“京京猜猜，核桃哪儿去了？”胖乎乎的妹站起来，仰脸看着高高的爸爸，嫩声嫩气地指着窗户“呀”了一声。“在这儿呐——孩子！”爸张开大手，妹惊奇兴奋地扑向爸。爸举起妹抱在怀里，屋里又沉寂了。

爸看到挂在墙上的快乐琴，放下了妹，“来，来，来，我给你们弹个曲子，爸爸以前会弹风琴，还拉过二胡，拉得不好，弹个什么呢？”爸瞅着妈好一会儿，“问孩子吧。”妈挣扎着做出高兴的样子。

“爸爸给你们弹个《东方红》吧！”爸摘下琴放到那二尺见方马粪纸板钉成的摇摇晃晃的小饭桌上，坐在小凳子上，拨弄起琴弦来，粗笨的手指头按下了琴键。

我站起来，轻轻到了院里，站在门口，仰脸看着天上将圆的月亮。后天就是正月十五了。春节前，爸给我和妹每人买了一个红的纸灯笼，我喜欢点起灯笼里的蜡烛，关上屋里灯，那种神秘的、暖融融的感觉。春节我和妹点着灯笼在傍晚的院里、胡同里走来走去，真的很高兴呢。

月亮又大又亮，外面围着一圈晕黄的风圈，月光照着地上枯树晃动的影子，院里弥散着我家飘出的《东方红》的快乐琴声。那声音绵长、凄凉、孤单，没有一丝温暖和快乐。琴声停下了，静了一会儿，又传出《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曲调，大概爸觉得这是我和妹最熟悉的曲子了。单薄的琴声在风中颤栗着，涟漪一般，慢慢地散发着它的忧愁与哀伤。

我悄悄用棉袄袖口沾干脸上的泪，重又拉门进了屋。爸说，我再给你们弹个《张老三》吧。爸站起来，高高的身子在10平米的小屋中来回走着，哼唱起来：“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唉，别再唱了……”妈打断了爸：“看看表……”这时，妈连看表的精神也打不起来了。

终于，到了送爸走的时刻。爸捧起我瘦小的脸，注视着，大手抚着我的头：

“孩子，听妈妈的话，你都长大了，不能再让妈妈费心了。”他又抱起了妹，还腾出一只手，提起一只大行李包，妈提另一只行李，我帮着拿一个小号的包裹，关灯、锁门。

冬天的胡同里没有人，远处昏黄的路灯在北风中忽明忽隐，路上就只有我们全家踏着积雪单调的吱吱声。我嗓子里哽着一团棉花一样，我不想当他们的面落下眼泪，想着自己和妹一年只有这十几天能每天见到爸，叫爸爸，能和爸妈真正守在一起，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

到长安街了，空旷的马路上，只有几个骑车的人端肩缩脖地赶路。那么快，去北京站的 10 路汽车就进站了，爸把怀里的妹交给妈，和我们什么也没说，拖着行李匆匆上了汽车。车门在我们面前那么快就关上了，站台上的娘仨向车上茫然地挥着手，售票员卖票的小灯亮着，爸站在车门处，依旧望着汽车站上的母女仨人，久久，久久。

直到汽车消失了，妈才拉起我的手：“走吧。”

娘仨重又返回刚走出的胡同，想着仅仅几分钟前，我们还是一家四口走在这条熟悉的路上，而从此全家又要开始一年漫长的等待。

到家，进屋，昏暗的小屋里还弥散着爸爸抽烟留下的味道，只是屋里显得空了许多。我和妈坐下来，看了一下表，妈说：“火车可能要开了”……

【乱世民情】

路漫漫（节选）

严正学

按：此文节选自作者的自传性散文《路漫漫》中的文革部分。在文革前的部分中，作者讲述了自己作为“反革命的崽子”求生学画的坎坷经历：刚识字时，父亲被打成反革命惨遭镇压；初中时，被打成右派的施老师因不认罪被插入粪桶；自己因出身上不了高中而下乡劳动；1961 年外出逃荒在上海街头画画；因画技超群考入浙江美院附中；文革前夕被打成反动学生。因不堪凌辱，只身逃往新疆，

在北疆的一个废弃的劳改农场做苦力，因其会画画被调到富蕴县文化工作队。该文最早连载于 1989 年的《中国美术报》。

1966 年的红色风暴，横扫神州大地，同样席卷着准噶尔盆地。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后，我们随工作团来到了阿勒泰，并被安置在专署文教科工作。阿勒泰，哈萨克语是“金子”的意思，曾因出产金砂和宝石闻名于世。阿勒泰市坐落在阿勒泰山南麓，市中心有克浪河潺潺流过。阿勒泰地区是哈萨克聚居的地方，由于历史的原因，哈萨克民族被分居在中国的阿勒泰、外蒙古的西陲和苏联的哈萨克斯坦，形成鼎立的局面。黄浴尘书记决定要让我在这座北疆的重镇建立几座城市雕塑，让阿勒泰的建筑能和苏联的哈萨克斯坦、蒙古乌兰巴托相媲美。因此我奉命为阿勒泰城创作《英雄骑士》和《哈萨克牧女》的雕塑，耸立在山城的广场上。雕塑的工作室设在阿勒泰电影院的后台。其间，我去函中央美院，得到刘开渠先生的回信指导。经过了整整三个多月的苦干，我和春柳完成了泥塑创作。翻模前，黄浴尘书记兴高采烈地亲自率领地区各部局官员和军区的首长们前来观赏。此时的中国，艺术没有作者自我，唯有长官的意旨。我被夸奖了，但我更清楚自己的匠人地位。

历史到这里又翻开了沉重的一页，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我的未婚妻朱春柳离开下乡的生产队来新疆结婚，也就成了大逆不道的“叛逃”。春柳受到浙江省海门区当权者的百般刁难。我母亲拿着阿勒泰地区公安局的准迁证和地委介绍信去交涉，被当场撕毁。中央不是还在喊着“支援边疆、建设边疆”吗？迫于无奈，我也像当时那些深信中央政策的人一样，向国务院投寄上访信件。

上访信被转回到海门区，触怒了当权官员。区知青办公室袁家尚和周勇木，亲临东京大队让队长和会计收来几十位贫下中农的私章，写了封代表当时最有革命势力的贫下中农联名信——“捉拿外逃分子朱春柳的通报”，投寄中央和阿勒泰地委，又在小小的海门城到处传播我们越境叛国，严正学被我边防军击毙，朱春柳关押在阿勒泰的谣言。一夜之间，满城风雨。红卫兵、造反派们抄了我母亲的家，烧毁了我在家的藏书和图画，我的母亲受株连遭游街批斗时，春柳母亲躲避天台；父亲朱干卿因此卧病不起，惶惶不可终日，至身亡气绝。

在这种非常时期，一封代表中国最革命力量的“贫下中农联名信”是能够让你三辈子翻不了身的。阿勒泰地委收到这封来信后，由办公室尚主任向我宣读信件的内容。尽管当时尚主任自身已是“泥菩萨过河”，但好心的主任还是规劝我们相信组织。由于我们坚持要回家平反，加上此时，春柳父亲已气绝死亡，母亲因恐怖中风瘫痪，朱春柳是独养女，所以我们离开阿勒泰势在必行。

隆冬季节，大雪封道，去省城乌鲁木齐只能坐飞机，预定了一个月后的机票。我们于1967年1月27日来到了乌鲁木齐。同一天，石河子事件（注：石河子事件发生在1月26日）打响了全国武斗的第一枪。乌市比起阿勒泰要热闹得多，省府被各种造反派组织占领，乌鲁木齐火车站被红卫兵小将接管，购买火车票得由这些学生们批准。枪林弹雨中的石河子传来惊人的消息：许多造反派被铁丝捆绑，严刑毒打后被抛在冰雪中活活冻死，为了抓捕造反派，乌鲁木齐市通往内地的火车、汽车被管制了。我好说歹说，才买到了车票。

乌鲁木齐车站的月台上早已挤满了候车的人，实际上买车票是多此一举。列车刚进月台，疯狂的人群就拼命往车厢冲，车门堵住了，就从窗口往里爬，打不开车窗的就敲碎玻璃钻进去。人们为了私利互相倾轧。这里是整个时代的缩影。

我们挤在车厢过道里，像被装进“凤尾鱼罐头”，喘不过气来。妻子挺着八个月的大肚子，瘫坐在小旅行包上。令人懊恼的是列车时时停下，终于在吐鲁番车站瘫痪不动了。

南疆的支边青年为了回家，采取了卧轨的“革命行动”，强行上车。在这被扭曲的时代，扭曲的人性支配着一种扭曲的革命行动。我们的车厢被摘下了，绝望的旅客只好下车到月台上找点食物、水和透口气。夜色降临了，搭不上火车的旅客快快进站找寻归宿，吐鲁番车站挤满了逃难的人。两只煤炉的余热招来了众多的旅客，围着它组成了两个放射形的图案。人们的希望就像这已熄灭的煤炉，留下的仅是些苍白的炉灰。

半夜两点钟，人群骚动起来，我们随着人流冲上了车厢。列车终于起动了，摇晃着向前开去，车厢的座位上、座位下、椅背、行李架上、盥洗处过道直至厕所里都挤满了人。没有水和食品供应，就这样煎熬了三日四夜后到达兰州。

下了车，我们已无足够的钱购买火车票，春柳又产期将近，我只好毛遂自荐去推销自己。红色的岁月，我唯一能做的工作就是绘制毛主席的油画像，在个人

迷信疯狂到极点的年代，这是个冒险的差使，稍不留神，就会随时有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危险，为了生存，一切的一切都顾不得了。

画了两个单位后，我又被兰州民航局邀去画一幅6×4米的标准像。民航大楼是兰州市军事保护单位，我在平台上画画，下边就是招待所，甘肃省委的许多高官显贵正在此避难，我和他们相处一起时，那些以往惯于发号施令的嘴巴，现在却整天发着喃喃的叹息。

在我筹集到旅费之后，立即又搭上了东去的列车。在这动乱的年代，在同样动乱的列车上，一个新生命，迎着厄运，在她最不应该降临的时刻，呱呱落地，降生到人间，这就是我们的女儿——严颖鸿。

踏遍了大半个中国，我们回来了，故乡！

没有人来迎接我们。因为我们被打成了外逃分子，政治危险分子，还有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像影子一样跟着我们。没有户口，没有粮票，没有亲朋好友，我们成了完全陌生的人。唯有母亲用慈母的心欢迎我们的到来，为我们的生活操心。

我们是为平反而来的，当然要找那些制造黑材料的当权人物交涉。找黄岩县委、找黄岩知青办、找海门区委，最后回到栅浦公社知青点后才知道：当时东京大队下乡知识青年柯正凯要起草文告，从大队办公室要来复写纸，竟在复写纸的印痕上，清晰地发现《关于外逃分子朱春柳的材料》的全文。为了抗议对知青的迫害，知识青年们成立“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决定由柯正凯执笔起草《十评有关朱春柳的黑材料》，发出呼吁，向社会散发。在造反派和各界人士声援下，海门区委不得不由葭止镇书记林普顺为代表签字道歉。

然而，在我们回乡没多久，两报一刊又发表关于“解放干部”的大块文章。黄岩县委、海门区委、黄岩知青办、葭止镇党委及东京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们都翻了脸。他们加紧搜罗材料，上纲上线上报，连粮票也扣下不给了，一种潜伏的杀机正对着我们。

这个时候，葭止平桥大队有个叫倪祥庆的知青，为了外出去偷盖大队的公章，结果被关进了牢房。倪祥庆是我的邻居，于是区党委指示办案的诱导倪招供，诬陷是我指使的。身居“人民警卫营”头头的武装部长李仙法，反复地对这个知青逼供：“我拉你一把是无产阶级光明大道，推你一下是资产阶级泥坑，我要你交

待，要的是严的罪行……”然而，倪庆祥始终不肯就范去陷害人，结果被五花大绑跪着在万人大会上批斗。

那年月，什么样的罪名都可罗织。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一开始，我被传讯去充当“毛泽东思想清阶学习班”的学员，实际上被定性为该清理的“阶级敌人”。在镇会堂里，坐满一屋的地、富、反、坏分子，都是老朽而不会动弹的“老阶级敌人”，仅有我，是这帮阶级敌人中最年轻的一个。清阶第一课是听张如明队长训话，那些老于世故的“老阶级敌人”，吹捧张队长是包公再世，“清如水、明如镜”。因此理所当然地都成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积极分子。我算什么呢？国民党的孝子贤孙、现行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政治危险分子、还是外逃分子……我觉得这幕戏滑稽可笑，跟着念念语录也没有什么兴趣，就在红皮书下夹了一本小说《牛虻》在看。看得入神时，张队长悄悄过来，不由分说夺走了我的书，把我抓起来，大骂我是破坏“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让专政人员把我押进反省室。接着张又过来对着我乱吼一通后，逼我跟着他念毛主席语录，因为他念得结结巴巴，我就对他说：“张队长，还是我来念，你跟着读吧！”他冲着我又吹胡子又瞪眼睛的，立即又推我进反省室。

第二天，我故意抱着刚满周岁的女儿颖鸿去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张队长一吼叫，她就会跟着哇哇地哭闹起来。

第三天，我干脆拒绝去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我想豁出去了，什么都不用怕。

又过了二十多天，清阶办公室还是整不出我的什么罪状，无可奈何派人叫我去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毕业”手续。我去学习班领了登记表，只见表格的上首“最高指示”下印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八个大字。这分明是拿我们当罪犯看的，我对着张队长说：除非把这几个字划掉，不然我拒绝填这张表格。队长怒不可遏，十几个专政人员对着我围斗，我愤恨又绝望地高喊：“有什么罪就拿镣铐来铐，我不想再辩白了！”自然，我受到更严酷的报复：

- 1、不给办户口，不给发粮票，全家都成了黑人；
- 2、不给劳动就业和出卖劳力的任何机会，断绝全家人生计；
- 3、由居民治保干部监视，不让外出，全家都失去自由。

在这“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年代，没有比烙上阶级烙印的后果更严重！生活到了最穷迫的时候，为了活命，我只能给人画像。没有人会给我发营业执照，

我就自己在门口挂个“为人民服务、绘画人像”的牌子。我的营生是为那些行将就木的老人绘画照片。在那最最革命的年月，拉大旗作虎皮，仿效到老百姓那里，表示孝子贤孙的唯一办法是替上代人画标准像以代替昔日的“牌位”，生前没有留下照片的死者，他们的子孙们还得求我去对着死尸画像。中外美术史上唯有我是对着死人画活人肖像的画家。

正因为我有把死人画成活人的本领，因此，在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的年月，为了表示自己是最最最忠于毛主席的革命派，那些政治家和革命头头们都找上门来，要我给他们画毛泽东的标准像。在这个自称世界革命中心转移到北京的时候，毛泽东被神化了。革命的徒子徒孙们从我这里请去“毛主席红宝像”，扛着它游行；对着它早请示、晚汇报；向着它扭屁股跳忠字舞。被打成黑帮分子的对它跪着请罪。一切都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就在这时，浙江省台州地区黄岩县的路桥镇，发生了一起“犯上”大案。有人在路桥邮电局邮筒里，投寄了五封攻击林彪副统帅的“反革命匿名信”。匿名信中所写“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疆”字中，“弓”的边旁下没写上“土”，被认定为诅咒，是暗示“死无葬身之地”。

顷刻间，大批警特搜捕，狼犬寻踪，北京专家亲临鉴定笔迹，人人过关，民心惶惶。地毯式搜捕后，侦查圈逐步缩小，最后一位叫苏思源的人被缉拿归案了。此公是右派分子，省广播局除名人员，被押赴临海县城关公判。

公判大会上，五花大绑的苏思源被插了斩牌，由于桀骜不驯，颈部的细尼龙丝就被军警勒紧，苏吐不出气，满脸紫红，扭曲的咽喉“咳！咳！”干喘着……主席台下指令制伏，两军警急忙踩住苏的脚镣，另有三名军警扭住苏思源的肩膀和左右臂，苏因窒息作垂死挣扎状，此时，行刑官举起了步枪，用枪口上的刺刀直捣苏的嘴、鼻和脸，顷刻间热血喷射……地下是片片殷红。

啊！我惊叫，即闭紧两眼祈祷他快快上路……那怕是去地狱也胜似人间！

造反、武斗、夺权！发狂的群众被操纵着互相斗杀。一次又一次更大规模的战争代替了零星的战斗。黄岩县黄总司头头金士土在院桥战斗中被击毙后，拖来城关，裸尸倒挂在黄岩青年路广场树杆上示众；支疆回乡青年郭和平贫病交迫吊死在黄岩县县政府的大梁上……

逃遁这现实的世界，找寻那花和蜜的春天，融向自然，让我们返回到原始时代的朴素中去吧！我决定经营养蜂的营生，它能够让我追随花期像吉卜赛人一样浪迹天涯。如果艺术终究要成为政治家们的工具，变成说教，那就让我永远丢弃画笔和调色板吧！我买了蜂和蜂具，一家四口人开始了养蜂的流浪生涯。尽管我们常常被蜜蜂蛰得嘴肥眼肿的。但我们空虚和不安的灵魂却得到了慰藉。

早春，养蜂队伍出发了，第一站去温岭岙环赶早油菜花期。半个月后，我们又转场到达宁波市鄞县钟公庙赶胜利油菜花期。我们多么像一群真正的波希米亚人，在路边旷野，用蜂箱和尼龙薄膜搭起一个个临时住地，拖儿携女、餐风露宿。似乎我们已真正远离尘世，在那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日子里，找到了一个又一个春天的宁静。

1969 年早春，中苏社会主义两大国在珍宝岛不宣而战。全民备战波及了我们这批游离于社会之外的人。蜂群到达宁波港后，再也搭不上北去的列车，眼看着就这样贻误了去东北采椴树蜜的花期。我们只好更换路线，从宁波转道天台在坦头赶柏子花期渡夏。

那一年春夏，天总哭丧着脸，时时降下雨水来。蜜蜂赶不上花期，蜂群由强变弱。绵绵阴雨，还得喂许多蜜和糖水。雨水多、虫害旺，农民一个劲地喷射农药，一大批一大批适龄的工蜂挣扎着倒毙在蜂箱前边。这早春的梦就像这雨水在水洼里激起的水泡，眨眼间破碎殆尽。

秋天，多愁的季节。我们怀着满腔哀怨和缕缕愁绪回到海门。蜂群采过瓦松花粉，又转到金清农场采集咸青以期越冬。没有过几天，放金清越冬的蜂群连同蜂具全数被偷，我们立即查明此系路桥谢恩来雇人所为。然而，这个自称“夏茅”的人，勾结龙头王村的贼，早买通路东公社的官，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头，你能到那里去评理或打法律官司呢？

“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在阶级斗争和自然斗争中我都遭到惨败。漫长的岁月，漫长的人生，我无所适从。

1971 年，我被黄岩县拱东公社所邀，全家来到长塘大队共办长塘竹丝画帘厂。在这艺术的沙漠里，我找到了最能接近绘画艺术的差使。画帘厂用人工抽成的细竹丝，以最古老的方式编织成竹帘，然后在上面绘製人物、山水、花鸟画，出口欧美为资产阶级服务。这种工作，比起对着死尸画活人像或是画那些千篇一

律的毛泽东红宝像，要有兴味得多。我夜以继日地工作，绘制成整套的样品，并获得了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的定点生产资格。

正当工厂顺利发展的时候，发生了两件事，使我不得不重新认识自己。当我的画艺在新办的企业里显示了价值的时候，公社和大队的干部为了拴住我并让我俯首唯命是从，他们操起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法宝，由书记任娃头专程来海门公安局调查我的家谱，因为我是个曾经劳改过的父亲，因此就宣布我为“世仇分子”。第二件事是在一个傍晚，我不顾一切地跳河救起了一位十来岁溺水的小女孩。我没有奢望公社表扬我，却招来党委书记的厉声责问：“严正学，你知道你救的是个攻击伟大舵手、英明领袖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的女儿！”有道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得到怎样的报应呢？阶级斗争的理论又将人性扭曲到何等地步！

工厂发展了，当权者的盘剥，各种交易中的变相贪污，使我热切的心凉下来，并决定离开我亲手创办的长塘竹丝画帘厂。接着，在海门我和街道待业青年又办起了海门工艺美术工厂。我们生产工艺品，用丝漏漆印的方法印刷包装以生产自救，工厂从无到有，开始得到发展。这是一个街道集体企业，自负盈亏，自生自灭。企业的生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给那些掌握有实权的中共官员“烧香送礼”，也就是通关节、走门路，如果你不理睬那一套，你就会处处撞上红灯。

1975 年夏秋的台风季节刚过去，革命委员会又刮起了强大的红色风暴。一夜之间，成千上万的群众被抓进变相的集中营。专政工具以革命的名义，大割所谓的资本主义尾巴。那时候我刚出差在上海，从电话里我得知：打办人员抄了我们工厂，拉去生产原料，使我们企业停产倒闭。我清楚这是县工交局长蔡继卓对我们的报复。我不能沉默了。我从上海打电报给县政府，列举蔡继卓的种种罪行。电波的传递，如爆开的炸弹，在海门和黄岩的官场掀起了轩然大波。他们动用了一切专政的工具，向我围歼过来。

实际上我还在上海时就被秘密监视了，待我上了浙江 403 客轮，就有“打办”的宗达贤跟踪，对我进行 24 小时的严密监视。第二天中午，轮船到达海门港时，椒江码头戒备森严，站满了戴红袖章的专政人员。在宗达贤的指挥下，十数名专政人员由王梅林主任率领从码头冲上轮船，他们和暗中钉梢的监视人员一起，捆绑并拘捕了我。尽管我挣扎着拒捕，但仍被制伏，前呼后拥地押进了海门

公安局。成了要犯的我，被他们一腿蹬进了拘留室。这十几平方米小屋，里边已关押了几十个犯人。一扇小门，挂着斤把重的大锁，窗口的铁栅上绕满了铁丝网，仅留下个小洞，作为外边向我们传递食物、水的唯一通道。

我不甘心就这样被剥夺了自由，好像觉得拘留我还应该给一张拘留证之类的东西。我对着经过窗外的黄岩县公安局（特派海门）局长林大兴发问：“林局长，关我在此，为什么没给拘留证？”林局长锁起眉心立即反问：“你是谁？”我说了姓名后，林局长恶狠狠地说：“你就是严正学，我要先关你四十天！”“局长，公民揭发当官的违法，犯哪一条王法？”“反对旗手江青的革命路线，扰乱革命队伍，你用国际明码电报，攻击革命领导干部蔡继卓贪污、奸淫知青……让全世界都知道了，你还不认罪伏法！”“蔡继卓确实有贪污、腐化的罪行，我不能揭发吗？”听我还敢反驳，林大兴咬牙切齿吐出一个莫名其妙的罪名：“你再说就是破坏农业学大寨，是现行反革命！”（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工交局长蔡继卓因贪污、奸淫知青被判刑8年。）

夜幕降临，我开始了生平第一夜牢狱生活。拘留室里关押的都是红色风暴打击的对象。没有什么大罪名，大家轮流讲述各种故事来打发漫漫的长夜。

蹲监狱最重要的是学会打发时间，我把研究看守当作消遣，对他们评头论足。轮流换班的共七、八个看守，其中最坏的是被称为S的老东西。一次送饭的时间，我故意在废纸里包了一把鼻涕，从视窗偷偷的丢下去。老S一个箭步窜过来，以为是传递情况的纸条，一把抓在手中，却弄得满手掌粘乎乎的，狱友们禁不住哄堂大笑起来。这一夜，老S存心要整治我们，我们一讲故事，他就拼命敲门训斥，我们则捂着鼻子装了腔对他喊话：“喂喂，老S，门敲破我们可都跑了，你可要坐牢吃官司的。”他停下刚转身离去，我们又天南地北地海讲。第二天是星期天，老S决定惩罚我们，他改变早晨放风的惯例，不让“犯人”出来洗脸、刷牙，也不让抬出粪桶。他不理睬我们的请求，我们冲着他抗议：“老S，电影里的法西斯，还给犯人放风。你比法西斯更法西斯。牢里的粪桶满了，无法‘吐故纳新’，你不给放风，又不让我们大小便，我们宣布全体绝食。”

一盒盒饭菜排列在窗外的长桌子上，早上的，中午的，没有一个人去吃它。几个好心的看守来劝我们，老S则出外搬来了区党委汤义方，又喊来局长林大兴。他们一阵嘀咕之后，我被点名出去。牢门一开，我就径直向院子里的厕所奔去。

我不理睬党书记的训话，并告诉局长：“我肚子痛，憋不住了，得先方便，才能听书记的训斥！”汤义方、林大兴无可奈何地等着，一刻钟，二刻钟，林局长不停地在天井转着圈子，三刻钟又过去了……汤拍响了桌子，林停下方步频频叫着我的名字。我系着裤带低着头急忙从厕所往外走，局长吼叫道：“不用系裤带了，连同鞋带一起交出来，你升级了！”我被关进后院的真正监狱。

拘留室后面，跨过二道上锁的铁门，里边是六间小小的小号牢房。我的天，所谓监狱，活像口棺材。四边是条石垒的墙，直立会碰到水泥顶板，一扇用角铁焊接的铁门，把我们和外部世界隔绝。这四、五平方米大的地方已横卧着六个人，角落里还停放着粪桶。他们存心整治我，把我硬推进关人最多的三号，倒连累了三号的六个人犯。当日该号在押的犯人有林大刚、叶祥林、豆腐太子、泮锡忠等六人……女号也关着几个人，也是被红色风暴刮进监狱的。林为厂里采购刚从上海回来，走出码头，就被专政人员拉进游街的行列挂牌示众，后边拷打着敲锣的是女号王彩招。

林先生比我年长几岁，听说他父亲林如青为共产党出生入死卖过命，资助中共地下党浙东三五支队、几次营救被通缉追捕的中共要员下海逃命，抗美援朝期间还捐黄金给共产党买飞机大炮；被他救过的徐德、陈蓝桃等后来成了中共高官，可林如青却在镇反运动中一夜之间成了阶下囚，不让辩解就枪毙了。那年头，权力代表一切，连乡下的农会主席开开口都能杀人，劳苦功高的林如青 37 岁被押上刑场，为共产党真把命给卖，饮弹而亡，死不瞑目，丢下寡妻和八个嗷嗷待哺的儿女……

林大刚在“世仇分子”之列，游街是“给出路”，示众倒成了“抬举你”。（到 1986 年拨乱反正，林如青又成为功高盖世的起义英雄，说是错杀，被迫认革命烈士。但林大刚一家至今没得到抚恤，没收的财物房屋仍被拒绝发还。）

晚饭后，我把剩下的饭菜和着开水搅拌，然后从狱门的小铁窗往下倒；其他六个犯人就跟着喊起来，并对莫名其妙跑来的值班狱吏王彩娥说：“新来的犯人要死了，又吐又拉，还抽着筋，要是传染病什么的，我们可就跟着完了。”看守和狱吏不愿深更半夜送我去医院急诊，就主动提出让我搬到隔两间的一号牢房，我说：“也许就是水土不服，换个环境会好一些，放出去就全好啦。”

我成了六面碰壁的人，面壁而坐，首先看到的是狱墙上题的一首打油诗：

狱门响一声，心里砰砰惊，要想心安宁，做鬼勿做人。

只见狱壁上种种漏痕，水迹血印都浮现起来。这里有绝望狱友留下的抓挖痕，也有发狂狱友头碰狱壁时洒下的片片血迹和血手印……一只绿头大苍蝇飞过来，发出嗡嗡的声音，我的目光随着它旋转，最后在狱壁上停了下来。苍蝇和血迹的组合，在我眼里变成了昂首挺胸的红棕烈马，苍蝇爬动好像是烈马的眼珠转动起来。此刻，整个牢房颤抖起来，我见到一群桀骜不驯狂奔的马。

强烈的表现欲望使我捡起砖屑、木炭拼命刻画着，同时抓起那瓶写交待用的墨水，往墙上乱泼乱倒……同牢狱友阿忠以为我发疯了，使劲地抱住我的双手，我只好用头发在墙上刷并用脚在狱壁上乱蹬乱踢。我不能让这闪现的灵感熄灭，我那狂放不羁的内心世界正被唤起。我凭一颗动荡不安的灵魂，以动荡不安的经历，去表现这同样动荡不安的世界。谁再能遏止我强烈冲动的情绪？我把人世间的苦难，我的悲哀和不幸以及对自由的渴望，都宣泄在这斑斑驳驳的狱壁上。

又过了一天，我的牢房中又关进一个因贪污和强奸罪入狱的人。此人捕前是莒止镇委书记，叫朱普根。入狱后他整天闷不作声，不吃不喝低垂的脑门耷拉在裤裆上。傍晚的时候，他突然歇斯底里地发作起来，一只手不住地在胸口比划着，念念有词道：“我是共产党！怎么让共产党员坐共产党的监狱？我，怎么能和这些地、富、反、坏分子关在一起？”

我们这间牢房关过一名将处极刑的人犯，他从杭州解押下来，手铐脚镣地在我们监里住了一夜。这一夜，三步一岗，戒备森严，因此，我们之间不能互相询问，在他进监时看守说他是押回温州正法的死囚，但他泰然的神态，确实使我们敬佩。

而眼前这公猪嗷嗷直叫真叫人厌烦。阿忠过去扇了他两巴掌，让他知道我们是好人，而他才是坏蛋！接着又蹬了他一脚，让这个“共产党”跪地请罪。我告诉他：“我们哀伤是因为我们被剥夺了自由，而你，只是痛惜失去了特权。”好在第二天“共产党”被上送黄岩蒲草田监狱，不然真不知道如何和这头公猪一起挨日子。

“秋后问斩”是中国刑罚的传统。到了那一天，杀头的、陪杀头的、还有那些不杀头的都得拉到街上去亮相。五花大绑游街示众。有经验的狱友告诉我们：

每年这个时候，总有这么一批人会遭殃的。我心里明白：专制的党书记、生杀在握的政法委还有贪渎腐败的工交局长蔡继卓是不会忘记在这种场合惩罚我的。

这两天放风时，我看到水沟边采水的蜜蜂，原来又是瓦松开花的季节，大批工蜂正在海门采集瓦松花越冬。我让狱友们每人捉上二、三只，养在纸折成的笼子里。到了批斗示众那一天早晨，狱友们都学着用蜜蜂在自己或眼睑或人中部位蛰一下。待到军警将我们五花大绑后拉出监狱，在提上刑车时才发现我们一个个都歪脸凸嘴，颜面肿大。公安局长林大兴嗷嗷地骂着，但他弄不清我们怎么都变成像刚用过火刑似的，喊来区党委汤义方、陈广洲，又请来书记杨华明，怕押到刑场示众，会适得其反。终于决定把我们推下刑车，押回牢房，就这样我们逃脱了强化专政的一次“陪斩”。

日复一日煎熬着，终于有一天，看守叫到我的名字。三十多天以来，我第一次走出这昏暗的牢房。只见看守所上方的青天下，悬挂着苍白的太阳，那冷冷的光芒照得我头晕目眩。林大兴局长一个劲地抽着烟屁股，然后狠命地丢在地上，用那只举足轻重的大脚碾了又碾。凶多吉少，我有一种预感。果然林局长一开口，就厉声追问要我交代“攻击”的罪行。我故作糊涂，反问：“揭发贪官污吏还是攻击罪行？”“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局长接着说：“你骂谁是秦始皇、谁是武则天、谁是秦桧？……坦白从宽！不交待，有你的去处！”局长拍响桌子，立即冲进一帮专政人员，将我摁在地下，钉上了脚镣；接着又用两副手铐把我两手铐到嵌在墙上的两个铁环上。此时，我脚尖悬地，一道强烈的灯光射得我眯细两眼，淋漓大汗顺着低垂头颅下滴。专政人员分班对我“车轮战”，我被24小时、24小时再24小时地拷问。我思忖着：“有你的去处！”的含意。“死，是另一个‘生’的开始”之信念，伴着我渡过了整整四天三夜锁着脚镣铐在墙上的拷问。连日审问，我的回答只有一句话：“既然你们比我清楚，那么，局长你说，我写！”

那个年代，仅仅复述一遍反革命言论也是现行犯罪，弄得不好，脑袋也得搬家！局长和其他人都不敢这么做，因此“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成了悬案。

1976年元旦后第八天，总理周恩来去世了。风云变幻的政治气候，使看守们变得和气起来。同监潘锡忠掐指一算，轻轻地对我说：“根据三百年前刘伯温的《烧饼歌》，今年是‘牛尾烧灰之日’，朱、毛都将要归天了！”又过了一些日

子，监狱要“吐故纳新”，再不能被我们长期占用，为了解决“人满为患”，共同相处一个多月的狱友们陆续被释放了。

又过了十三天，好心的H看守告诉我，今天你会出狱了。

终于煎熬到这一天，我特地用墙上涂画的砖灰和炭粉，把自己的脸抹得漆黑的。等到看守开门让我走出牢房时，威严的公安局大院爆开了笑声。我深吸了口气，慢慢吐着说：“天真黑，碰了满脸的灰气，脸是可以洗干净的，但被你们沾污的名誉怎么能洗清呢？”林局长左脸颊抽搐着，终于没有再说什么，交还我皮带、鞋带之类的东西，让我填了个表格结案，一场犯官祸就如此结束。

这一年，东北出现了巨大的陨石雨，唐山大地震又收走了几十万生灵。“四五”天安门广场血腥镇压，人心惶惶。朱德、毛泽东也相继升“天”……

“你办事，我放心！”接着又是“一批两打”运动，我还是那些当权分子的眼中钉。区党委再一次把我关进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班设在育才路小学，每个学员有近十名专政人员轮流看管，连大小便都跟着。车轮战、疲劳战、歼灭战！不堪忍受的去上吊、跳楼、触电！

中队指令我们交待从政治到经济，从生活到作风等诸多问题。在强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我早就成了诚惶诚恐的小民，在同样是读语录开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我一字一顿地说：“本人无党无派人士，经济问题是：一九七二年我趁尼克松访华之机，从美国购得原子弹贩卖给英国，获暴利一千万美元；生活作风问题是：十六岁那年，梦里幽会过一个少女，但至今还不知道她的名字。”中队长陶通友哭笑不得，连声骂我胡说八道。因为态度问题，第二天我就被送去强制劳动。不管你有多大冤屈，不肯唯唯喏喏，就是你的罪状。因为我在劳动中又顶撞了看守长，第三天我被作为“损害无产阶级专政形象”的典型，去接受更严厉的惩罚。专政的铁拳对准了我。中午开始，工作人员日夜轮班对我进行车轮战、疲劳战和攻坚战。我被孤立在小方凳上，接受他们永无止休的轮番进攻，不屈辱就灭亡，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和我同排挨斗的水泥船厂厂长高梓清上吊了！人死后，直挺挺地躺在门板上抬进了批斗会堂，高成了死不悔改的现行反革命之鬼，还要被当众鞭尸批斗，工作队逼大家振臂高呼“高梓清畏罪自杀死有余辜，永不翻身！”

夜静了，空旷的会堂中，除了专政人员，仅留下一直一横的两个“反革命”。横的已自绝于人民，直立的我足趾肿胀，脚肿得凸出塑胶凉鞋之外。

夜深了，连连打着瞌睡，任凭蚊子的进攻和看守的吼叫，横、直一样，都无动于衷了。在这个世界上我挣扎了三十多年，我挣扎不下去了……

天啊！我活够了，我活得厌烦了……

我低垂着头，此刻我的灵魂正离开我的躯壳，飘飘然向阎王殿奔去……青面獠牙的阎王小鬼们怎么也不肯接纳我……唉！我活腻了，我活得实在太累了。钻不进阴曹地府的我又被推向凡界，当我被死去活来折磨着，在阴阳世界挣扎，在天堂和地狱里沉浮的时候，冥冥之中，我被“热烈祝贺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口号声惊醒。顷刻之间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高音喇叭响彻云霄！人们永远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似乎是中国又一次踏上了新纪元，革命派和政治家们连夜组织游行，又一次振臂高呼“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1977 年春天，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自上而下又搞起了“粉碎四人帮”展览会。又要我去绘制华国锋的标准像，画什么“你办事，我放心”之类的油画，因此我又被提前解放了。我已经僵硬和麻木了，我真正怀疑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艺术曾经是自然的奴隶，后又是宗教和神话的奴隶，现在,艺术成了政治的奴隶。艺术家带着一颗被鞭笞的灵魂，如何逃脱这样的厄运呢？

路漫漫……

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1978 年写于椒江。文中所涉及的人物和名字皆系真人真名，大多尚在人世。)

【简讯】

[有关内蒙文革的两本书出版](#)

[舟 人](#)

一.《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在香港出版

启之著《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于 2010 年 1 月由香

港天行健出版社出版。作者当年是初二学生，于 1968 年 9 月从北京赴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土默特左旗插队，后抽调到内蒙古铸锻厂铸铁车间做混沙工。作者在内蒙古期间亲历了“挖肃”运动。此后十数年间，又经过多次调查采访，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写成此书。

与一般的文革史著作不同，此书并没有局限于“挖肃”运动，而是努力寻找这场运动的历史根源，并且试图揭示出这一运动所产生的影响。因此，此书的第一章和最后一章既是重点难点，也是其独特之处。这一点从字数和篇幅上就可以看出来：此书共十一章，近六百页。第一章一百页，约占全书的六分之一。第十一章和“结语”共五十余页，占全书的十二分之一强。在重点难点之中，关于乌兰夫采取的经济、文化政策，以及他与中央的矛盾的分析，关于“走向民族和解”的论述，则是本书的重中之重，难中之难。

此书中的一章曾在 1993 年由瑞典中国学学者、文革史学家沈迈克教授译成英文，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出版。其中的某些章节曾在《当代中国研究》、《北京之春》、《往事》等刊物上发表，后被收入宋永毅主编的《文革大屠杀》、《20 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等书中。宋永毅、郭建等编撰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辞典》（英文）中的内蒙部分亦来自此书。

此书是香港天行健出版社推出的“大历史现场”丛书的第一部，著名的文革史家余汝信担任特约编辑。沈迈克、徐友渔、何蜀为此书做序。

二.《内蒙古自治区的文化大革命》第一、二辑在日本出版

在日本国静冈大学人文学部任教的杨海英先生积数十年之功编辑的《内蒙古自治区的文化大革命》第一、二辑。分别于 2009 年和 2010 年由日本东京风吹社出版。此书是一部内容丰赡的内蒙文革的资料汇编。

此书的第一辑《滕海清将军讲话汇编》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编者关于内蒙文革的介绍性文字。第二部分是滕海清在内蒙文革期间的讲话、指示和检查。第三部分是批滕派对滕海清及赵玉温等人的批判文章。

此书第二辑《肃清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文件汇编》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编者关于“内人党”历史、性质的介绍和研究，以及对肃清内人党文献资料的疏理和解释。第二部分包括四方面的内容，其一是 1966 年至 1969 年初中共中央关于肃

清“内人党”的文件。其二是1969年4月至1972年间，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古的文件。其三是关于“内人党”与民族自治的历史文献。其四是关于“内人党”冤案平反及民族问题的资料。

【书评与序跋】

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

——《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序

沈迈克

启之先生的无比详尽的内蒙古文革史终于要问世了，从我首次有幸去阅读那一大捆沉甸甸的手稿的那一刻——那时个人电脑在中国还十分罕见——我就一直默默地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这本书的初稿就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而你，亲爱的读者，看到的则是一部经过修改、重写以及知性升级的必读的大部头。作者的学识是如此地令人敬畏，以至于我当年不能不选取其中的一部分，竭尽所能将其译成一部未定稿的小册子——《内蒙古的文化大革命：选于一部尚未发表的历史著作》。作者署名 W. Woody。拙译出版后，西方研究现代中国最权威的学术刊物《中国季刊》发表了一篇书评，对拙译做了较高的评价。迄今为止，该书评仍是唯一一篇针对一部“未定稿小册子”而不是正经的“书”登载在《中国季刊》上的文章。这一事实充分地说明了将这一被期待的史书付梓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启之的著作不仅在文革文献上填补了对一个特殊的政治、社会以及民族复杂性地区的空白，而且在中央与地方、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的学术研究方面也具有令人瞩目的贡献。

在中国内外，人们常说，最好的文革研究在海外，因为那里的中外学者都生活在一个很特殊的智力环境——即所谓“西方”。我从来不相信这种说法，启之关于内蒙古文革的著作，以及他对文革与中国电影的关系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欧洲的学者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对“发生了什么”有那样全局性的认知，并像他那样敏锐地分析出“这些都意味着什么”。

毛泽东曾说过，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的中瑞两国人民有着共同的愿望。我想说，回顾历史，我们同样享有另一种共同的渴望：忠实地记录历史，并将其传给后人。正是在这一点上，我相信这本书具有难以夸大的价值：它是最具权威的历史，它有经过严谨研究后写出的引人入胜的生动故事，它的实证根据重比泰山。

瑞典 隆德大学

语言与文学中心

2007-08-02

注：本文题目是作者故意套用的毛泽东文革中一个批示中的话。

【书评与序跋】

民族的不幸源于政治的不幸

——《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序

徐友渔

启之著《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是对文化大革命中发生在内蒙古的大悲剧的真实说明。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的浩劫，对中国人民而言是大悲剧、大惨剧，而内蒙古地区的人民，尤其是蒙古族人民，其悲惨尤为为深重。因为这里除了全国普遍发生的批判斗争“阶级敌人”、“黑帮分子”，不同派别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1967年“二月逆流”中的镇压之外，还发生了所谓“挖肃”运动即清查“内人党”运动。仅据官方公布的数字，这场运动导致“在全自治区共挖所谓‘内人党’三十四万六千二百二十人，刑讯武斗致死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致严重伤残八万七千一百八十八人”。虽然后来官方的正式立场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但由于当局不愿意面对历史，特别不愿意承认迫害少数民族的事实，所以关于内蒙古的文革历程，存在许多含混不清、扑朔迷离之处，对于文革中发生的惨剧，存在严重的隐瞒和歪曲的说明。

本书的价值首先在于对内蒙古的文革历史作了忠实的、全面的描述。通过此书，读者不但可以看到文革烈火迅速燃烧到内蒙草原，工作组短暂的领导一切，群众组织的兴起及其派别斗争，1967年二月军区对造反派的镇压等等文革中全国各地普遍发生的现象，而且还能了解到军人公然抗命，周恩来和其他中央大员多次在集会上被起哄攻击，中央下令对内蒙古实行“全面军管”，以及把内蒙古肢解成五部分勉强维持领导和控制等不同寻常的情况。中国区域辽阔，民族成分复杂，文革中既有政令高度统一的一面，也有不同地区——尤其是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呈现独特性的一面，启之依靠大量翔实的材料——包括很多一般人无法接触的内部材料、自己亲自采访作的记录——复原了内蒙文革的曲折、复杂、惨烈的历史。看得出来，作者在内蒙的生活经历，他与蒙族各阶层人士的密切关系，对于他的写作，对于他有能力对历史事件的性质做出正确判断，起了重大作用。

本书不但对内蒙文革作了迄今为止最客观和全面的描述，而且为理解内蒙文革提供了相当有深度的历史和背景材料，这包括近代以来内蒙社会、政治生活的变化，内蒙民主力量和共产党力量的崛起，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之前和之后对内蒙政策的变化，还包括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蒙族共产党首领乌兰夫的态度和处理，尤其是作者着力描写的、与文革发动同步的“前门饭店会议”——在此会议上，刘少奇、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宣判了乌兰夫的政治死刑——这一切使得读者有可能对内蒙文革作一种透视。本书对于蒙族学生在1981年发动学潮的记载既提供了难得的信息，也为理解内蒙文革的后果与影响提供了线索。

如实地反映悲剧很难，而正确地认识悲剧发生的原因则更难。这种难度的表现之一是，哪怕是那些有亲身经历的受害者，也人云亦云地把悲剧的发生完全归咎于林彪、“四人帮”和康生。作者尖锐、明确地指出，扯上林彪纯属胡说八道，“四人帮”和康生固然有责任，但他们都不是悲剧首要的、直接的制造者，真正的元凶是毛泽东，是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本书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是毛和中央对以乌兰夫为首的蒙古族干部和群众加上的“民族分裂”的罪名，造成了草原上巨大的惨剧。

根据本书的描写，内蒙文革充分说明，毛泽东和最高统治集团使中国的政治生活活像绞肉机——这也是著名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的说法，除了毛本人，任

何人没有逃脱覆灭的命运。整乌兰夫的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很快垮台，附和
华北局整乌兰夫的内蒙党委和军区的干部没有逃脱被整肃的命令，对军人郑维山
下令以“征服者”身份入主内蒙的陈伯达和郑维山本人成了“反党集团”成员，
“挖肃”运动的直接指挥者滕海清最后落得备受煎熬，甚至在“前门饭店会议”
上代表党中央处理乌兰夫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文革刚开始不久就被列为中国头号
和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然，面对这无可逃遁的大悲剧，作者还
是清醒和悲愤地指出：“文革使一切都变成权力祭坛上的牺牲，然而，滕海清等
人失去的只是封爵受赏，造反派失去的是青春年华，‘挖肃’的受难者失去的则
是生命。”

作者在描写和反思内蒙古的文革悲剧时，彻底摆脱了大汉族主义情绪，他把
发生在一些蒙汉族杂居区的暴力事件直截了当地称为“民族迫害事件”，本书不
但揭露了内蒙古人民在文革中遭受的政治迫害，而且揭露了蒙古族人民受到的民
族迫害。可以看出，民族不幸源于政治的不幸。

人们容易轻率地使用“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在我们从未听到对内蒙惨剧
有公开忏悔，从未见到公开道歉的情况下，我们怎么相信历史翻到了新的一页？

2007 年 11 月 2 日

于北京寓所

【书评与序跋】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序

何 蜀

在文化大革命前期，许多红卫兵、造反派组织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都有一个常演不衰的保留节目：歌舞《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舞台上，
男女红卫兵（有的着军装，有的着蒙族服装）边唱边舞，做出骑马奔驰状跑圆场，
满脸是喜悦幸福的神情，歌中唱的是：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从草原来到天安门，

无边的旗海红似火，

战斗的歌声响入云……

这首歌因其草原风味加上曲调优美节奏明快而脍炙人口，并被国务院文化组选入了官方推出的第一本文革歌曲集——1972 年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30 周年而出版的《战地新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创作歌曲选集》。

当各地的文艺宣传队员及普通民众唱着或哼着这首歌的时候，他们大多不知道内蒙古草原上正在发生着什么，当然更不知道在那“战斗的歌声响入云”的背后，内蒙古草原正上演着一幕惨绝人寰的历史大悲剧——“挖肃”。当时，“全国山河一片红”，全国各地都陷入空前浩劫之中，除去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统一展开的清队、清查“五一六”、“一打三反”等等阶段性整人运动外，文革浩劫在各地的表现又各有特色，如天津的批判“黑会”、“黑戏”，湖南的“围剿黑三线”，湖北的清查“北、决、扬”，黑龙江的“反右倾”，四川的“批清”，云南的“划线站队”，广东、广西的镇压“反共救国团”……在各地的“特色”运动中，内蒙古的“挖肃”无论是持续时间之长，还是打击面之广，手段之残酷，影响之恶劣，后果之严重，均够得上“名列前茅”。

本书就是这一历史大悲剧的真实记录。

在本书之前，已经出版过另一本同类题材的书：图们、祝东力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出版的《康生与“内人党”冤案》。从该书的标题即可看出，它将制造内蒙古文革大悲剧的罪魁祸首确定为康生。这对于能够获准公开出版的有关文革历史的著作来说，确是煞费苦心的。因为官方定下的调子就是如此。官方的说法适应不同时期的政治需要发生过变化，但有一个最根本的不变的原則：不能触及真正的罪魁祸首。在刚开始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 1978 年 4 月 20 日，内蒙古党委呈送中共中央的《关于进一步解决好挖“新内人党”问题的意见的报告》中称：“这一错案的祸根是林彪、‘四人帮’，责任在原自治区党的核心

小组几个主要负责人。”后来，随着历史真相的广为人知，把罪责笼统地推到林彪、“四人帮”身上似乎说不过去了，于是就变成了“两案审判”中的说法。在1980年11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和1981年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中，都把造成内蒙古人民大灾难的罪魁祸首判定为康生、谢富治。有趣的是，《康生与“内人党”冤案》一书，把这些不同的说法都排列在正文前面，不知是为了表明该书的主旨还是表示“立此存照”。

此书则完全摆脱了官方调子的束缚，从历史的真实出发，坚持自“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以来的良史传统，不为尊者讳，不为权贵隐，秉笔直书，通过大量历史资料和采访记录，向世人揭示了内蒙古那场历史大悲剧的真相，并得出严肃的结论：“民族和谐的前提是民族和解。民族和解的前提是弄清真相，伸张正义，责任人承认罪责，对受害人公开赔礼道歉，并向社会保证永不再犯。弄清真相就是要弄清楚文革发生的机制和原因，伸张正义则是要追究发动、领导文革者的责任，惩办‘挖肃’运动的直接责任人。文革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运用国家机器进行的一场政治运动。追究发动和领导文革者的责任，首先要追究毛泽东的责任，追究使毛泽东‘无法无天’的制度的责任。在党国一体的中国，毛泽东是国家的最高领导者，他是以国家的名义、通过国家机器发动文革的。因此，追究发动、领导文革之罪同样也是追究‘国家之罪’。”

本书还有一个特点是，不仅深入研究了文革时期内蒙古历史大悲剧的来龙去脉及其主要发展过程，还从更广阔的历史大视野的角度，将笔触往前延伸到了文革之前以至民国以前内蒙古草原上民族纠纷的渊源，往后延伸到了文革之后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遗留问题及由此引发的学潮……毛泽东曾经断言：“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真实的历史恰恰相反，在那些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背后，常常反映出来的是民族矛盾问题。而毛式“阶级斗争”运动，只能使民族矛盾更加激化，更加复杂化，更加难以解决，最终两败俱伤。因此，本书的意义已经超出对文革历史的研究。对于关心民族问题的人来说，本书也值得一读。

我是通过王年一老师认识本书作者启之的。王年一老师在给我的信中多次提到他，说他除了讲学、写电视剧和电影研究论文外，“还写过关于内蒙内人党的

专著，此君对人十分热情。”本来王老师是准备为本书作序的，但不幸因疾病的原因，还没等到启之将书稿最后修改完成，王老师就永远放下了手中的笔。

我因对文革历史研究的兴趣而与启之成为朋友。在读他这部书稿时，深为他严谨、执着的治史态度所感动。一个外地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弄清内蒙古那段“被掩饰的历史”当作自己的事业，且不说这是什么精神，只要想想其中的艰辛与风险，就足以让人肃然起敬。

我们常用一句古训来告诫东邻：“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其实，这一古训对我们自己来说，也是需要时时记取的。本书的出版，即可成为防止历史悲剧重演的“后事之师”。

2007年10月17日

于重庆风江阁

【闲读偶记】

因因果果

——读书札记一则

邵燕祥

麦克法夸尔、沈迈克合著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开头第一章“第一轮排炮”中，记述1966年3月4日到4月8日，在邓小平、彭真、叶剑英的共同主持下，来自军队不同部门的42名高级干部开会批判罗瑞卿。“昔日的战友们现在知道要他们干什么了，罗无法忍受对其个性和行为的残忍抨击，3月18日他试图自杀。”“下面是3个月后刘少奇向党外知名人士作的冷酷的报告”——

此时他就住在自己住的三层楼跳楼自杀，受了点伤，没有死，现在住在医院。

本来，自杀要有点技术，应该是头重脚轻，他却是脚先落地，脚坏了点，头部没有伤。(邓小平：就像女跳水运动员那样，跳了一根冰棍。)他的这种行动……是严重地对抗党……

该书接着写道：“毛在杭州的政治局常委会开会期间从电话中得知了这一消息。他的直接反应是问：‘为什么跳楼？’接着评论道，‘真没有出息！’”

关于毛的这一反应，所据为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载张化、苏采青编《回首文革》下册，中央党史出版社 2000 年版。作为党政高级干部的回忆录，中直机关所属出版社出版，经过报批审查，所述应是被认可的。揆之常理，批罗本来就是毛的决策，他有这样的反应，符合他一贯的性格和当时的语境，应该可信。

关于刘、邓的话，引用的可信吗？这两个人在 5 月“彭罗（瑞卿）陆杨反党集团”被打倒不久，于 8 月间被抛出来，曾经使我们惊诧，也为我们所同情。他们能说出这样绝情的话吗？再读一遍，几乎难以相信这样的话出自任何一个有起码同情心和道德感的人之口。面对多年的同僚，哪怕有过些小的个人恩怨，在其落难毫无援手只能一死了之的时候，这样幸灾乐祸的话怎么说得出口？何等的刻薄寡恩，何等的不仁不义！

这是帝国主义反动派的造谣诬蔑吧？看书的尾注，引自文革中政协全国委员会机关、卫东革命战斗队、东方红战斗团、红卫兵造反派编《彻底摧毁十七年来政协工作中的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1967。难道是当年造反派的诽谤中伤？

然而，联系到在党内斗争中发言者批判揭发他们战友时的表现，联系他们的性格和语境，我相信上引的记述是基本符合事实的。刘、邓在这里也是一种表态，这样才与当天的会议基调吻合；与反党集团成员划清界限，蔑之如“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谁叫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呢？理应“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政协机关，近水楼台，他们召集党外知名人士来听取刘、邓等通报中共党内斗争情况时，即使没有录音，也会有不止一份记录稿。上述印出流传的刘的报告（包括邓的插话），如果不是根据与会者的记录稿整理，应该就是来自档案。文革突起，机关瘫痪，档案可能有流失，但当时还不兴销毁档案，不仅是顾不上，而且因刘作这一报告的当时，不但不认为有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体面，而且正可见其敌我分明，大义凛然呢。

在这里，我无意于指责已故的大人物。几句话，在他们一生的功业和言论中，不过一芥微尘而已。但我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却不免感到深重的悲哀，为罗

瑞卿，为刘少奇和邓小平，也为千千万万曾经卷入混战的人们，包括我自己。

我想到了“报应”二字。

俗语说，报应循环，丝毫不爽。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虽是历史上给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弱者以精神支撑的抚慰，也是无力改变现状的人们对以强凌弱者的诅咒。刘少奇在教诲众人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曾经引用过俗语“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为什么到1966年自己先就忘记了呢？也许是已知大祸临身，心慌意乱，急不择言了？或者竟真的也曾想到过自裁的一路，怎样才能一次完成，无意中向台下听讲的知名人士们泄露了天机？那就比简单地落井下石更可悲了。

想一想刘少奇的下场，真的是“报在自身”。我几乎不忍再接着说，邓小平在听说他的儿子坠楼的口信时，恐怕已经忘记了他在描摹罗瑞卿跳楼时的僥薄了吧？

还有罗瑞卿，在他多年来从事保卫、肃反和警察工作中，由于种种原因曾经造成不少的冤案，大概都曾以革命的名义自欺欺人。只是在自己也落到了被迫害的境地，苦辣备尝以后，复出时积极有力地支持了“真理标准”讨论，应该缘于对事情的因因果果有所了悟了。

按佛家的，甚至民间多神崇拜中的说法，这些都可以“因果报应”来解释。而多年来，这是我们当作“迷信”加以反对的。

我没有研究过民间信仰或佛教信仰中的因果报应，但我以为，从哲学的因果律来解释一些社会现象、人事关系中的前因与后果时，就会发现确有一种“历史的惩罚”，是可以理出所以然的端绪的。

中国的传统道德，讲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夫子留下后半句话没有直说。

你们崇拜暴力，你们迷信“不斗行吗”，你们相信非我即敌，你们只讲阶级性不讲人性，只讲忠诚不讲理性，你们为了显示忠诚显示革命的坚定性彻底性，不惜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冤死害死饿死千百万人也只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相比下的“失误”，这样的政治格局、思维逻辑、行事轨迹，从施之于人，最后终不免也会返之于己。

这样的因果关系不是明明白白的吗！？

【闲读偶记】

无语对长城

胡 泊

《中国·沉默的长城：北京 2008 年 11 月》，是美国检察官本杰明·哈里斯先生来华调查卞仲耘遇害案后写的一份调查报告，读后让人一时无语。

哈里斯先生在调查中“共与 7 个人谈话”。他为卞案采访这些人，其理由及收获，据在下整理，分别是：

1.王晶珪（遇难者亲属）——“‘您认为谁应该为杀害您的妻子负责？’……王先生并没有目击那次犯罪……我提出了问题，他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毛泽东。’”

2.叶维佑（遇难者学生的朋友、亲属）——“是与非，对她来说，是清楚的道德价值，而非她的堂妹、红卫兵和中国政府所认为的某种复杂的智力概念。”

3、4.徐唯辛和高强（艺术家）——“并不是因为他们可能有任何关于卞仲耘凶杀案的信息。他们没有。我利用采访两位艺术家的机会征求他们关于个人责任问题的意见……”

5.无名氏（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未谈卞案问题。

6.马继森（义务为王晶珪做翻译）——“她的《外交部文革纪实》非常重要……”

7.宋彬彬（遇难者学生）——拒绝见面，不愿谈这个话题。

显然，除了拒绝出现的宋彬彬之外，上述人士均非案发时当事人或目击者，其中多数与卞案甚至毫无关系。莫非，哈里斯先生不掌握相关线索？但是，调查报告中偏偏出现了应采访却未采访的两个名字，即：

1.叶维丽（“美国华裔学者，宋彬彬和刘进的朋友”）。出局理由似为：“叶女士动情地写过她如何曾将毛泽东当作偶像来崇拜和热爱，又如何解魅的故事。”

2.刘进（“杀害王先生妻子的红卫兵领导人之一”）。出局理由似为：“刘进

是……给王先生送来卞仲耘‘死了’的‘正式文件’的人之一。也是她在第二天通过大喇叭通知学生们，‘卞仲耘死了。死了就死了。这事不要再提了。’【注，大喇叭里通知的，实际是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的原话。】”

这两位，一位是卞案研究者（哈里斯先生承认：叶为学术刊物写过题为“卞仲耘之死”的文章），一位是卞案当事人。一位与哈里斯先生同在美国，一位与宋彬彬女士同在中国。既然为调查卞案下这么大功夫，想找她们应该并不困难。报告中却未对此做出解释。哈里斯先生把美国刑法的目标解释为：“首先，不让任何无辜的人受到犯罪指控”。那么，采访非研究者、非当事人，却不采访研究者、当事人，是否可能导致无辜的人受到犯罪指控？检察官先生所谓“典型的美国男性的愤怒”，不正应为无辜者被冤屈而发吗？

对此，无语的不仅是在下。宋彬彬女士拒绝接受采访，自然是一种无语。接受采访的诸位无人语及卞案真相，其实也是一种无语。王晶垚先生承认，叶维丽、刘进几年前到家慰问自己，想必当时是有话要说的。但是，她们不在采访范围之内，读者无法知其语，还是一种无语。所谓“沉默的长城”，其实就是这么造就的——其中，也有您，检察官哈里斯先生的一份责任。

哈里斯先生还提出：“美中两国都有许多外行认为，没有亲自动手的人就不能承担‘责任’。”所以，即使文中没有证据表明宋彬彬、刘进在卞案中“动手”，没有关系，一样承担“责任”！其实，从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标那一刻起，毛、宋、“兵”，这三者在文革受难者心中，就重合在一起，难解难分了。而这三者具体到底干了什么，人们反而不甚了了，看来也不想在了。毛已于1976年去世，至今仍受官方护持；“兵”已于1968年解散，被官方定为反面组织；只有宋尚以平民身份在世。1966年8月的恐怖、凶杀、罪恶、暴力、羞耻，种种罪名，她不认，谁认？她不背，谁背？

宋彬彬女士未能露面，是遗憾的。卞案早已非个人恩怨，而是干部子弟与知识分子阶层的内伤、民族创痛的疤痕。正如哈里斯先生所言：“卞仲耘遇害事件对中国具有历史意义”。为了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女孩”，为了自己和自己的女儿、孙女……宋彬彬、刘进乃至叶维丽们，应该发出声音，把当时发生了什么告知世人。须知，今天离过去并不遥远，无非少了一个毛泽东而已。而一团浆糊的民族记忆状态，是生产愚民和暴政的最好培养基。

诚然，中美两国刑法“有着深刻的区别”。不过，寻找真相，不枉不纵，既是法律的要求，也是历史的原则。检察官是“受美国式训练的法律工作者”，在下是北京侦探推理协会会员，殊途同归。早就听说：“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外国。换句话说，“犯案”在中国，“审案”靠外国。这不，沉冤 40 多年的卞案，终于被美国检察官过问并受理，由洋青天来作主了。不争气的中国人以及其中的个别文革研究者，对此只有无地自容的份了。

最后，以卞案一见证人的读后感结束此文：

“老外的文章我看了，我觉得没有价值，抒情多于论证，抒情也是基于别人的二手资料，比如采访了叶维丽的姐姐，但是什么具体事实也没有，不知道美国检察官就是这样办案？他如果问到我，恐怕我会问他一堆问题呢。宋彬彬的失策就是不愿意和人谈这个问题，自己的清白还是要自己站出来说，去年夏天是在冯敬兰、刘进的鼓励下才开始谈的。”

【一瓣心香】

纵无健笔书青史，不敢心声付蛀尘

——悼《记忆》之友刘向宏

启 之

一

2009 年 9 月，我们到回龙观去看向宏。她瘦得皮包骨，脸色灰黑，倚在沙发上，坐都坐不稳，惟独两只眼睛清亮明澈，依旧有神。临走时，我握着她的手说：“你好好养着。怎么也得坚持到明年。《记忆》创刊两周年，还等着你的贺诗呢！”向宏什么话也没说，只是淡淡地一笑。

从她家一出来，妻子就埋怨我：“哪有你这么说话的！你让人家坚持到明年，这不是等于说人家活不长了吗？”我没分辩。作为客套，我这话说得不妥。作为常识，这话并不错——肝硬化兼肾衰竭，既吃不下饭，又无有效的治疗，怎么可能活得长久？

四个月后——2010 年 1 月 30 日晚 8 时 26 分，向



宏逝于北京武警总医院。享年 56 岁。《记忆》失去了一个忠实的读者，一位真挚的友人。

(右图：刘向宏遗像。)

因为身体不支，向宏在 2008 年就退了。听说我们要办《记忆》，她给我打过很长的电话，谈她当年办《传记文学》的经验。《记忆》问世之后，她强撑病体，为它介绍作者，推荐文章，并向亲朋好友广为传发。当年 10 月，在《记忆》出了四期之后，她写了一首七律，诗前有序：

值此非驴非马之世，逢兹官吏胡嘏之时，欣悉《记忆》问世。友朋传来，四期历历。其匡人言之谬误，有求真之心；驳有司之欺瞞，无犬儒之态。特赋诗一首，以示敬意。

读《记忆》有感
日暮危栏败柳风，
黎民涂炭九秋蓬；
从来世事烟云锁，
自古江山雾霭重。
断简残编究有迹，
雪泥鸿爪宁无踪；
多情最是东流水，
时作惊涛裂岸声。

这首诗登在了《记忆》第五期的“编读往来”之中。它成了向宏在《记忆》上的绝笔。

二

向宏原名“向红”——“红心向党”或“向红太阳”。是她自己改成了“向宏”。虽仍在党，仍在毛泽东余威的笼罩之下。但志趣与主流大不同。那年吊唁

赵紫阳就是一例。

既然生活在北京，就要尽可能地进入现场，成为历史的亲历者。这是向宏的信条。赵紫阳去世第七天，我们估计当局会放松警戒，于是相约去吊唁。头一天晚上，我给她打电话，嘱她写幅挽联，一定把八九年赵紫阳在广场上那著名的“无所谓了”写进去。第二天一早，她拿来了：

难为汉相，宁做楚囚，大丈夫无所谓了。

青史留名，人心自在，小朝廷何足道哉。

内行知道，古诗中的对仗，虚词最不容易。向宏以“何足道哉”对“无所谓了”，既工整又贴切。我一边往宣纸上抄，一边说：“不管挽联有多少，这个肯定能进前三甲。不过要是人家追查起来，我也肯定要跟你吃瓜络。”向宏笑了笑，到一边抽烟去了。

赵紫阳是2005年1月17日逝世的，那天已经是1月24日。可是富强胡同的大路口和马路边上，还有两辆警车。几个警察在胡同口站着，便衣在马路两边晃。不过，他们倒没找我们麻烦。

到了六号院大门口，两个便衣把我们拦住：“你们是干吗的？”

向宏：“吊唁赵紫阳。”

“你们是赵紫阳什么人？”

向宏：“朋友。”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向宏：“没单位。”

便衣指着向宏挎着的相机：“把这个留下来。”

向宏好像没听见一样，若无其事地往里走。奇怪的是，便衣也若无其事，既不说话，也不阻拦。我们大摇大摆进了二门。向宏发议论：“这两位也太不敬业了。至少也得嚷嚷两声呀！”

二门口有一木椅，椅上放着一个纸盒，盒子里面是做好的纸花，赵紫阳的女婿给我们一人发了一个。我们小声问他，里面还有没有便衣了。他没说话，只是暧昧地笑了笑。

灵堂里，不少人在照相。向宏跟我说：“你看，人家都把相机带进来了。看来没几个人听那两个便衣的。”

一个小时之后，我们从赵家出来，那二位便衣早没了踪影。

三

在向宏的志趣之中有一条：行侠仗义。她不签名，不发帖，不当舆论领袖，不当公众人物。她做的是具体的事。我认识她，就是因为她帮我出书。因为苦于在大陆出不了书，八年前，我写了本《中西风马牛》，借老外的嘴说中国电影的事。书尚有些可读性，在刊上发了，网上也有流传。可是试了四五家出版社还是出不了——有的让我删去对雷锋精神的评价，有的让我删去江青和样板戏。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友人推荐给了文艺出版社，向宏是此书的责编。她非但没让我删，反而让我加上了一些原来想说又不敢说的话。

不过那书的封面让我不高兴——在书名下面，加了这样一句话：“通过对电影的解读，提供多种伦理依据和价值尺度。未出版即被多家报刊连载，转载。”我问她，“这是谁写的？什么解读、伦理、价值的，人家还没看就吓跑了。”她说：“你知道吗，这是我特意给这本书涂的保护色。审读小组看到这种提示，会以为这是一种专业书，就会放松审查。”向宏的解释给了我灵感，在送给她的书上，我题了一首打油诗：

太平盛世惧民言，

恢恢文网又一年。

装痴卖傻苦遮掩，

骗得官家买路钱。

这回轮到向宏不高兴了：“我们辛辛苦苦给你出书，倒落个上当受骗，你可真没良心。”

书出了半个月之后，文化部给出版社打电话，说孙部长听说了这本书，要出版社送去几本。社领导给部长送去五本之后，赶紧把向宏传来，问她书里到底写了什么，怎么惊动了部长？向宏好言抚慰了领导一番。可人家还是七上八下——按规矩，这书本来是要这位领导把关的。因为向宏是老资格的编审，所以领导就没看。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我、向宏也紧张起来——我怕牵连她，她怕书被禁，领导怕整顿检查。

一个礼拜以后，向宏告我：“部长打来电话，说《中西风马牛》很好。表扬我们社出了一本好书。希望我们再接再厉。”

不负部长厚望，我再接再厉又拿出两本书来，第一本是《中国电影研究资料》，另一本是《中国电影的改造》。前者是资料集，后者是十七年电影史。它们都属于非虚构作品，我没法装痴卖傻，向宏的“苦遮掩”也不灵了。资料集有四万元的出书补助，二百多万字，分了四册。向宏担心文革时期的电影资料在审查时会出事，劝我砍掉第四册。我知道她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这样做，只好忍痛割爱。而那本电影史，向宏则完全束手无策——它涉及到反右，我修改了 N 次，向宏还是说肯定通不过——除非把 56、57 年的两章拿掉。我跟她发牢骚：“邓小平说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拿掉了那两章倒是符合小平的精神了。可历史能减去两年，从 55 年直接跳到 58 年吗？”我提出自费出版，试图保住那两年。向宏不点头。我明白了，这本书成了她的滑铁卢。她的侠肝义胆、勇气智谋在书刊审查面前无能为力。她所能做的，就是为这本书题诗——

题《中国电影的改造》

信史千年搏浪沙，

铁函沉井傲官衙。

文章溯本功独到，

胆识归真书自华。

武训途穷样板举，

庐山斗转影坛伐。

烬余心火民间继，

涤扫堂前噪暮鸦。

此书在我手里放了 N 年，今年在台湾问世。可惜，向宏看不到了。

四

在“五〇后”的同辈人中，向宏在格律诗上的造诣是第一流的。她的诗有意境，有情致，音韵和谐，对仗工稳。我是学古代文学的，与向宏相比，自愧弗如。

“纵无健笔书青史，不敢心声付蛀尘”。这是向宏的诗句，她将其所思所感，化而为诗。逝世后，我整理了向宏的诗作，得诗近四十首。其中有两首值得一提。

2005 年 5 月中国艺术研究院召开“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育活动。地点是北京郊区的什么度假村，事先通知各位党员带游泳衣/裤。向宏给我发来了一首七律——

保先洗脑出京门，

反腐依旧度假村。

阔论高谈名利宴，

浅斟低唱绮罗身。

陈规早继文革去，

新政偏图专制存。

可叹欺人欺己后，

复言天下一家春。

党员到度假村去学习文件，在“名利宴”、“绮罗身”中“保持先进性”。在这种“欺人欺己”的形式走过之后，还要“复言天下一家春”——为太平盛世歌功颂德。向宏的清醒表明，中共党内有一股自我反省、自我更新的强大力量。

向宏的诗告诉我们，她的清醒源于历史意识。请看她作于 2005 年 6 月的诗：

一十六载又国殇，

风雨如磐夜未央。

每恨奸邪歌盛世，

岂堪谄佞道吉祥。

江河不废天行健，

正气长存人自强。

敢问乾坤再造日，

友朋共话慨而慷。

在此“国殇”之日，向宏每年都要为它诉诸笔墨。2007年这一天，她给朋友发了这样的短信：“十八年前的记忆还是如此深刻，那一天的此时，我噙着眼泪凝望着长安街上弹洞累累的铁护栏，只觉得心也已经千疮百孔。今天想来，那情景还是如此清晰，这记忆将永不磨灭。”

记着这个日子的，何止向宏。

向宏病倒之后，每个周末仍旧给大家发她在防火墙之外看到的资讯。其中有一篇台湾“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纪念碑”的碑文：

台湾实施戒严期间（1949年5月20日—1987年7月14日）及其前后，有许多仁人志士遭受逮捕、羁押或枪杀，时间长达四十多年。此种惨痛事实形成恐怖气氛，笼罩整个社会，成为台湾人民挥之不去的梦魇，影响社会发展至深且巨，史称“白色恐怖”。

昔日威权体制下，统治者高高在上，迫害人权，剥夺自由，造成无数生命的陨落、家庭的破碎和种种不公不义，举国上下遂长期处于不安与恐惧之中。1990年代之后，在国人流血流汗，持续努力下，台湾走出威权统治，逐渐形成自由民主的社会。

保障人权，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是民主国家所服膺的普世价值。我们不仅要追求历史真相，追究责任，更应记取教训，使执政者不再重蹈覆辙。因此建立纪念碑，祈愿台湾从此成为民主、自由、人权和正义的国家。

这个碑文很多人都提到过，智效民在《炎黄春秋》上为其撰文，傅国涌的博客上有它的照片……向宏无文无图，但其所思所想，尽在不言之中。

五

是什么力量驱使向宏做上述这些事呢？是性格，正义感？历史意识？不管是什么，反正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源于生活——或是对现代历史文化的读书

和思考，或是对中外资讯的留心 and 比较，或是对民生的关注，对生态的忧虑；或是出于对同类的同情，对邪恶的憎恶……总之，它是思想、性格、阅历、经验的混合体。这种混合体，我无以名之，称之为志趣。

其实，有类似志趣的人多了，党内党外，精英庶民。谁愿意撒谎骗人？谁不渴望说真话，谁不知道历史无情？只不过，知易行难。绝大多数的人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像向宏一样知行合一。

装，是这个时代的真正特色——下面装着服从；上面装着相信下面的服从。在公开场合装孙子，私下里则是“草泥马”。而这个装，越来越假，越来越不耐烦。一位监察机关的处长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干部的嘴就像妓女的B。”我很惊讶他的坦率——他跟我认识不到一个小时。

白桦跟我说过一件趣事：当年艾青握着他的手，老泪纵横地称赞：“了不起了不起，你写了个好剧本。你替人民说了真话！”可几天后，在批《苦恋》的会上，对《苦恋》上纲最高，对作者斥责最烈的，还是这位大诗人艾青。白桦告诉我，当时艾青刚从外地回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他要装出紧跟听话的姿态给上边看，以便上边早点为他落实政策。

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除了极恶之人，谁都惦记身后名。“人相食，是要上书的。”刘少奇用这话提醒毛泽东，说明他的历史意识。毛怕历史，所以要打倒刘少奇。他忘了他说过的“人间正道是沧桑”。

他忘了，人民没忘——2009年清明节，中国人权活动家遇罗克的雕像在北京通州宋庄美术馆落成揭幕。在不久的将来，林昭、张志新、李九莲、钟海源等巾帼英雄的塑像也会矗立在这块土地上。尽管无数事实昭示我们，维护正义，追求真相，即使在“依法治国”的和谐盛世中也仍旧是一个艰苦卓绝的事业。尽管在主流文化的时代英雄榜上，找不到那些为这一事业流血流汗、受苦受累、忍辱负重的仁人志士的位置。但是，他们不负历史，历史也不负他们——或迟或早，与台湾那座纪念碑同类的建筑物将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在这个纪念碑上，将镌刻着他们的名字。在这些名字中，你将找到刘向宏。

2010-2-6，向宏逝世第七日

【史林一叶】

《毛泽东视察湖南的指示》与“省无联”的命运

陈益南

有位原文革中湖南“省无联”负责人的朋友，向我说过一件事：当年他们“省无联”案的当事人，1968年2、3月间先后被捕入狱后，关押了一年多，至1969年上半年时，在狱中听说湖南省当局曾打算将他们这批“运动犯”（即因“省无联”案被捕者）予以释放，但后来却没有释放，在该年11月29日，反倒给他们判了刑。在获刑时，有关人员私下曾对他说，是毛泽东到湖南来了，有指示，所以，不仅不能释放他们，而且还要判刑。

因此，这朋友问我：1969年时，毛泽东是否对“省无联”一案下过指示？

对此，我以前并不清楚。虽然知道毛泽东确于1969年到过湖南，也对湖南省负责人作过一些指示，但是，毛泽东那次究竟作了些什么指示，只见过一点只言片语，而从未完整看到。后又知道那指示记录，在中央与省的档案局都有复制件，只是，我等平民百姓无权索阅，要“有关部门批准”才看得到的。

近日，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一本《毛泽东五十次回湖南》，是由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部门主编的。之中，首次披露了1969年毛泽东到湖南的这次谈话（见本期“小资料”），从而得以知道了毛泽东那次指示的全貌。

从1969年毛泽东到湖南的这次谈话记录看，“省无联”案的人员最终被判刑，的确与毛泽东的讲话有些关系，或者说，毛泽东对此事的谈话，促成了湖南省革委会采取措施，将“省无联”案人员予以治罪。毛泽东在谈话中对“省无联”问题是这样说的：“出极‘左’极右，是社会上有那股思潮，省无联极‘左’，那时很吃香，有一股极‘左’思潮。不过他们要重新建党建军也看见马上不行，所以提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

毛泽东的这段话中，最让湖南省革委会不敢不对“省无联”一案从重从严处理的，就在有“他们要重新建党建军”、“所以提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这两句。又是“重新建党建军”，又“提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这还不是反革命？！岂还能以“犯错误的老造反派”来看待“省无联”案人员？！

如果说，虽然对“省无联”一案人员，已关押一年多，但是，由于其涉案人

员的确都是文革前期的老造反派骨干，有些还是湖南曾响当当的“名人”（“湘江风雷”头头张家政、“高校风雷”头头周国辉等），加之，湖南前段文革中，还发生过中央文革错误批示镇压“湘江风雷”、后不得不由中央出面又为“湘江风雷”平反的事情，所以，湖南省革委会当局便始终没有轻易处理这些被关押的“省无联”案人员，一直给拖着。

1969年4、5月间，湖北省的造反派工人发动了“反复旧”运动，以抵抗某些文革前政治形态的复活。这个运动影响到了湖南。虽然湖南造反派没有用行动响应湖北造反派的运动，但长沙市街头出现了大批转载湖北造反派反复旧内容的大字报，长沙市的工人造反派也都在关注湖北的事态。

在这种形势下，关押“省无联”案人员的长沙市公安局看守所，无疑会有反复旧运动的消息传进去（公安局也有参加过造反派的干部），因此，牢房中的“省无联”案人员，由此可能产生了乐观想法，认为他们可能像前段被关押的“湘江风雷”人员一样，也会获得释放。毕竟，他们都是文革运动中的问题，不是刑事犯罪。

不料，1969年的形势，不再是造反高潮的1967年。中共“九大”的胜利，只是体现在最高层，并非沐惠于底层。1969年底，湖北、山东的反复旧运动被彻底镇压，为造反派生存呼喊的声音不复再有。同时，因抗洪抢险工作紧急，而未来得及传达毛泽东6月28日谈话的省革委会负责人，于11月12日在省革委第四次全会上，向与会人员进行了传达学习贯彻。从而毛泽东轻轻巧巧对“省无联”一事说的几句话，在那个“一句顶一万句”之际，便被省革委会很快落实到了严肃处理“省无联”一案之中，认定“省无联”一案为反革命案件，由长沙市公安局军管会于11月29日将涉案人员一一予以治罪判刑。

2010/01/20

【故纸堆】

毛泽东视察湖南的指示

（黎原同志的记录）

1969年6月28日上午9时45分至12时，毛泽东接见黎原、华国锋（注1），

陪同接见的有汪东兴同志。

主席开始问湖南的情况如何？

我们汇报了湖南的情况，谈了湖北反复旧对湖南有些影响，也出过几张大字报，转抄武汉反复旧的消息，作了工作后，局面稳定。着重汇报了目前一个一个去狠抓团结工作，注意做好两派的群众工作，我们对跟梁、尚（注2）犯过错误群众，亦重视作团结教育工作时，主席指示：永向东（注3）、梁、尚是少数，要教育团结多数。

当汇报到梁、尚说五十二个县是老保翻天时，主席问湖南多少县？（答九十四个县市）。主席接着指示：永向东、梁、尚是打着反复旧的旗子，实际他们搞复旧。又指示说，他们说的那样革命，革命革得那样彻底，五十二个县，还四十二个县是革命的，成绩就很大。

当汇报到我们进驻长沙“五厂一站一校”的体会时，主席指示：是的，各派关系解决不好，就不能把广大群众团结起来。路子走对了，就对了。

接着主席问到高司（注4）的学生怎样？

我们汇报六七、六八届的毕业生已分配在军垦农场参加劳动锻炼，整个学生连队都表现很好，军队同志对他们很欢迎，六九、七〇届去湘西参加劳动，接受再教育。主席接着指示，除年老多病的外都下去，教员也下去。主席又问他们去湘西语言能听懂吗？常德到湘西是另一语系。

当我们汇报到对各派群众都不能压时，主席指示，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不能压。

当汇报到抓点时，主席指示：点不要铺得太宽。

主席问湖南这样大，四十七军搞得得了吗？我们汇报在地区主要靠分区、县武装部支左，地区革委会的主任现在大都是分区或县武装部的负责人。四十七军两个师搞生产，打算再抽一批干部参加搞去。接着主席指示，点铺的不要宽。

当问到湖南落实政策抓人情况时，主席指示：内蒙扩大化抓了二十多万人，省并不大，好就是没杀人。对敌人也要区别对待。有些老工人，没有参加国民党不见得（注5），搞清楚了根本不要处理。不要学北京大学抓了九百多人，抓多了不好处理，抓了怎么办？总共九千多人，哪有那样多的坏人！

主席问：农村公社所有制怎么办？你们也提出这个问题，小队还是大队为核算单位？我们汇报了石门县的情况，说明基本核算单位不能轻易变动。

当汇报到湖南去年能够取得丰收原因时，主席指示，过去彭、黄、张、周的黄克诚，就是给韶山东西，不发扬群众的自力更生的精神。大寨好，好就是好在自力更生，发奋图强。主席指示，去大寨人多了成灾，你们自己搞自己的大寨。大寨是大队核算，八十多户实际是一个大一点的生产队。

主席又问湖南有无平坟山的？我们答没有发现。又问农业生产上的单一化如何？

我们回答说有所改进，过去光种稻子，现在种棉花、茶叶、烟叶、地瓜、苞米、麦子等等。

接着主席指示，过去三年灾荒，彭、黄、张、周、刘少奇说要八年即七〇年才能恢复，要分田到户，他们没有料到恢复这样快。

在汇报到干部解放情况时，主席问了李强、高文礼（注6）的情况。

（汪东兴同志插话，派遣特情的情况是公安部罗瑞卿、徐子荣指示的，应由他们负责）

主席指示说，高文礼我看是好人，高司、红联、公检法（注7）过去臭了，公、检、法多数是好人。

（汪东兴同志后来又说，搞窃听器的材料我看了，不要疑神疑鬼，不要道听途说。我亲自领导，并说李强不太熟，高文礼据他看是拥护主席的，可能是个人喜欢吹、泄密、说错话）。

主席指示：干部解放，有些人调换一下地方，在省委工作，在长沙久了可以到地区、县，在下面久了亦可调长沙，地区之间亦换一换。犯了错误改正就是。群众分两派，各解放各的干部。一个单位分成两派已经三年了，要联合起来，如果你还要分两派，再搞三年，但总是要联合起来。要做工作，解放干部有些可以留下来继续工作，有些可以调到别的地区。

接着主席又指示，机关人太多不好办事。军队机关人少些，中央、省、地、县四级地方机关人多。主席当时问军部多少人？黎原说一百多人。

主席又指示，刘建勋、纪登奎参加了1966年10月的工作会议，这会议是给打招呼不要压群众，不要靠一派压一派，他们听进去了，回河南召集地、县委书

记开了会，现在他们地区、县革委会百分之五十一是原地、县委书记当第一把手，但他们没有给大工厂的人打招呼，所以那里的领导干部出不来。

接见快结束时，主席又指示，高司、红联、公检法大多数是好的。高司的军队欢迎，大家影响好啦（指在农场）！

主席指示：看来湖南形势好，抓点比上两个省抓得早。

当我们请主席再作指示时，主席指示，我是想问问情况，你们看到形势好、并注意另一面的想法是对的。年成秋冬才能定局，现在不宜估计过高。有些苗头应该看到，也不要估计过了。前年来时还不是急风暴雨，你们办公地点一天要搬几个地方。前年和去年上半年是高潮，你们出了高司、红联、公检法，出了省无联（注8），又出了永向东，以后还可能出点什么，但大局不会有什么。出极“左”极右，是社会上有那股思潮，省无联极“左”，那时很吃香，有一股极“左”思潮。不过他们要重新建党建军也看见马上不行，所以提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

最后主席指示：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主席接见时间两点一刻之久，从9点40分钟到将近12点。

摘自中共湖南省党史委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的《毛泽东五十次回湖南》一书。

注1：黎原，时为驻湘的解放军47军军长，省革委会主任；华国锋，原省委书记处书记，时为省革委会副主任。在当时所谓“三结合”的革委会中，黎原是解放军代表，华国锋是领导干部代表。

注2：“梁、尚”即梁春阳、尚春仁，支持造反派的省委机关干部。梁春阳，原为省经委副主任；尚春仁，原中共湖南省监委处长，文革中组织省委机关造反组织“永向东”，为负责人。省革委成立后均为常委。

注3：“永向东”，其全称为“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永向东革命造反战斗团”，是由省委机关干部组成的造反派组织。1968年春夏期间，该组织掀起了包括反对华国锋在内的“反右倾”运动，从而与支持华国锋的部分工人造反派发生了争斗，但不

久即在中央提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大趋势下，遭到失败，组织解散，其负责人尚春仁以及支持他们的梁春阳，均遭到批斗。

注 4：“高司”，其全称为“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起初是湖南最早造反的大学生红卫兵组织，但从 1967 年初起，由于得到省军区的支持，立场转到与“湘江风雷”、“长沙工联”等工人造反派组织对立的一方，客观上成为了当时湖南保守派阵营的旗帜。

注 5：原文如此，按湖南话意思，即：不见得没有参加国民党。

注 6：李强、高文礼分别为文革前的湖南省公安厅厅长、副厅长。

注 7：这里是指湖南文革中三个曾得到省军区支持的主要保守派组织。

“红联”是湖南省以“高司”为首的保守派组织联合体，全称为“湖南省红色造反者联合委员会”。“公检法”这里指的是组织团体，当时湖南的公、检、法系统大多数人，都是站在保守派一方，他们也成立了几个大的组织。一方面他们是政法机关的执法者，可以持枪抓捕造反派成员；一方面他们又可以组织群众性团体（如“湖南省公检法革命造反司令部”），拥有写大字报、上街游行示威、参加各种群众性活动的权利。后来在中央作出关于湖南文革问题的“八·十”决定后，包括“公检法”在内的保守派组织全部溃散。

注 8：“省无联”，是由湖南造反派中的激进团体组成的一个松散的、联席会议式的组织，全称是“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1968 年 1 月 24 日，中央领导人接见湖南省各派代表时，宣判“省无联”是“反革命大杂烩”。随后该组织即被摧毁，其负责人及部分骨干（包括当时撰写了《中国向何处去》一文的中学生杨曦光）被逮捕、判刑。1981 年，中共湖南省委作出了为“省无联”案平反的决定。

【故纸堆】

文革中权威人士谈王、关、戚事件

阎长贵 辑录

按:王关戚即王力、关锋、戚本禹,是1967年8月和1968年1月被先后抛出来的三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们都是文革初期的红人和干将,为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冲锋陷阵,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为什么被抛出?这是迄今没有完全说清楚的问题。不论是官方的文革著作(包括与文革有关的著作),还是坊间的个人文革著述,在谈到王关戚事件时,一般都是采用杨成武文革后回忆的说法(即毛泽东在上海叫杨回北京后告诉周恩来把王、关抓起来)。而杨的说法和文革期间权威人士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在大庭广众场合的说法有很大不同。为了引起文革研究界的关注,阎长贵先生从《江青十年讲话汇编(1966-1976)》一书中将这些权威人士的有关讲话辑录下来,加了附记,并就此提出了十四个问题。本刊特将这些文字合为一体,刊载于次。

在1968年3月15日中央首长接见四川省革筹小组领导成员时,江青说:“王、关问题就是我们端出来的。”姚文元马上接着说:“就是江青同志端出来的。”

在1968年3月24日中央首长接见军队干部会议上,林彪讲话说:(杨成武)“他同王、关、戚是勾结在一起的,很多王、关、戚的坏事情,是有他的份的,他才是一个真正的后台。……表面上杨成武对毛主席,对毛主席司令部是拥护的,但是,实际上他是对毛主席不忠诚的,对中央文革是不忠诚的。并且用这种特务手段(按:指侦听)来侦察毛主席的行动,侦察江青同志的行动。(叶群: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誓死保卫江青同志!反对对江青同志的迫害!)去年

夏天，主席要他去北戴河同我谈王、关、戚（当时是王、关）的问题……可是他
不肯去，经过主席再三的催促才去的。……表面上他是拥护江青同志的，但是，
实际上他是对江青同志不满的。江青同志有病的时候，他同戚本禹这些人在去年
春天就搞江青同志的黑材料，实际上成立了一个专案迫害江青同志。”（此材料选
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
册第 90 页）

在 1968 年 3 月 24 日中央首长接见军队干部会议上，周恩来讲话说：“我们
中央文革自己把暗藏在内部的一小撮坏分子端出来了……（口号：打倒王、关、
戚！）而像刚才江青同志所说的，王、关、戚都是在刘、邓司令部的时候，他们
那时候提出的人。中央文革非常英明，一发现他们有错误就自己端出来……”在
27 日首都十万人大会上，周恩来又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每一历史时
期，……江青同志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央文革里，江青同志非常严格地要求
自己，也是严格地要求同志，用毛泽东思想的尺度，来考察每一个同志，分清敌
我的界限，当着是同志的时候，她非常诚恳热心地帮助同志，当着判明是坏人的
时候，她就敢于勇敢地把他端出来，这种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我们要
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
志……”

在 1968 年 3 月 24 日中央首长接见军队干部会议上，江青讲话说：“像王、
关、戚，我们过去是不知道的，他们原来就是中央文革当时起草小组的时候，是
刘、邓他们安插进来的，他们就是刘、邓、陶、彭、罗、陆、杨的黑秀才，打着
红旗反红旗，他们许多事情不请示伯达同志，也不请示我，更不请示毛主席、林
副主席，他们封锁，并且把我们架空，使我们和同志们隔离，和小将们隔离，干
了许多坏事。他们的罪恶就是我去年九月五号讲的，妄图动摇以毛主席为首、林
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妄图打乱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他们妄图破坏
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我们把他端出来了。……当时，我们为了受蒙蔽的、受迷惑
的群众，我们很谨慎地采取了分割政策，我们大家讨论，并且向我们的毛主席请
示了。但是王、关，我们分割不开，戚本禹的作法跟他们不一样，我们希望他能
回头，但是不然。到了下半年，戚本禹更猖狂了，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现象。……
在原则问题上，我们是摆到台面上和他们进行了斗争的。例如去年十一月九号和

十一月十二号两次文艺界的座谈会，我就是不点名地批评戚本禹的。”在 1968 年 3 月 27 日首都十万人大会上，江青又讲了相同的话，她说：“在去年四、五月间又出现了‘左’倾冒险主义或者叫做极左，形‘左’实右，它的头面人物叫王力、关锋、戚本禹，我们过去不知道他们是刘邓的黑爪牙，他们是刘邓安排在我们革命队伍里的钉子，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到处招摇撞骗，不请示不报告我们，封锁我们，架空我们，耍阴谋，干了很多坏事，因为他们是黑爪牙，我们把他们端出来，挂起来，不要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因为他们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角色，势必蒙蔽欺骗一部分群众。这样我们对他们采取非常谨慎的政策，采取分割政策，王关分割不开，戚本禹作法不同，因此分割开来一个时期。但是分割开来不等于说他没有问题。果然到去年下半年他更猖狂起来了，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现象。……我们内部在原则问题上和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去年十一月我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不指名地批评戚本禹。他勾结着杨成武，他们勾结很早了，我们不知道。”

在 1968 年 3 月 24 日和 27 日两次大会上，陈伯达将抛出王、关、戚称为文化大革命的“第四次胜利”或“第四回合的斗争”，他说：“我们把刘、邓、陶留下的一些爪牙，隐藏在文化革命小组里的几个小爬虫——关、王、戚或者王、关、戚揭露出来了。”接着，陈伯达讲了杨成武和戚本禹相互“勾结”的情况，他说：杨成武“是一个中等的变色龙，不大不小……比王、关、戚稍大一些，他实际上是王、关、戚的后台。……他搞了一篇文章，《大树特树》，这篇文章事实上是要大树特树杨成武的绝对权威。这是真的，他在军事单位里，他就说要大树特树杨成武的绝对领导，只是改了一个字……。关于这篇文章的发表……我也是有错误的，我在这个会议上作自我批评。杨成武当时把这篇文章交给我和姚文元同志的时候，放在我那里一个多月，那时候我们两人是商量过，谈过的。我们不打算发表他这篇东西。但是他不断催，不断打电话。……他看我们没有动，他找戚本禹去了，直接间接地对我们施加压力。虽然是这样，我们还是可以把关的，不发表它。结果还是没有把好关，让他发表了。……不让它突出，放在第二版。这时，他又串通戚本禹，说他的文章是‘代表全世界人民的声音’，戚本禹又来向我们施加压力，说什么‘为什么不登这些消息呀！他是代表全世界人民声音的，为什么不登？’……（江青同志：我昨天还听说戚本禹为这个事，跑到他家里去，代

表中央文革向他道歉，他全家送给他勋章，我们过去不知道。)”

在 1968 年 3 月 24 日中央首长接见军队干部会议上，康生讲话说：“在文化大革命进入到争取全面胜利阶段中间，毛主席的阳光又将一小撮混入到文化大革命的队伍中间，是刘邓安置的变色的小爬虫王、关、戚的面目揭露出来……应当说江青同志起了巨大的作用，树立了特殊的功绩……”在 1968 年 3 月 27 日首都十万人大会上，康生说：“王力是个国民党，王力是执行邓小平、王稼祥‘三和一少’路线的积极分子，他在 1962 年莫斯科会议上就实行邓小平的‘三和一少’的路线，得到了赫鲁晓夫的欣赏，还要送给他金质奖章。关锋、戚本禹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是彭真的亲信……黑帮反革命叛徒彭真收买关锋、戚本禹，向他们联络，请他们吃饭，这些变色的小爬虫，就感恩戴德，在 1964 年 1 月 27 日戚本禹也代表关锋给彭真一封信，在这封信里这么说：他说‘初次到彭真家里，感到有些拘束，但是吃了饭的时候就舒服了，就已经像在亲人家里一样’。他们是彭真的亲人了！他赞扬叛徒彭真说：‘彭真平易近人’，‘善于诱导的作风’，……戚本禹说他‘对照自己的思想作风和缺点，更加意识到应该努力去改正自己的缺点。’就是全部投降。这些事情我们过去是不晓得的，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揭露出来了！特别是江青同志先将王、关，后将戚本禹的问题揭露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大胜利，也是中央文革，江青同志的巨大功绩。”还说：杨成武表面上“反对王、关、戚，但是实际上他是王、关、戚的后台。伙同戚本禹，一起整江青同志的黑材料。”

在 1968 年 9 月 14 日中央文革碰头会领导接见首都工宣队军宣队代表时，江青讲话说：“……成立了中央文革起草委员会。中央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起草《五一六通知》。在这个时候，这个起草委员会的中央文革，刘、邓、陶他们就安下了钉子，我们是不知道的。当时王力、关锋、戚本禹，他们跟吴传启、潘梓年这些反革命有着关系。我当时只是作为一般的党的工作人员把关，劝他们不要跟他们来往。因为我不了解这些人，平时没有听说过吴传启。知道有个潘梓年，但也知道是个大叛徒。”“王力、关锋、戚本禹、肖华、杨成武、傅崇碧、余立金，他们是勾结在一块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发现了他们跟吴传启这些坏家伙勾在一块儿，我做多次的思想工作，都碰了钉子，希望他们回过头来，但是他们不听。一下子端出三个人来，要影响群众的，这是大局。所以我们中央文革开会讨

论，采取分割政策。但是王关分不开，戚本禹暂时分出来了。……这个天派、地派是人为地给分开的，是王、关、戚，肖华、杨成武、傅崇碧这些家伙在背后操纵分开的，多数小将是受蒙蔽的。”

在 1969 年 8 月 14 日江青接见文艺口同志的谈话中说：“‘五一六’是个反革命组织。他们的后台杨、余、傅，还有混进中央文革的坏人王、关、戚。”

在 1970 年 1 月 24 日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传队代表时，周恩来讲话说：“下面把‘五一六’著名的头头讲一下。一个是吴传启，湖北人，是国民党特务，参加过伪国大竞选……解放后跑到中央计委，最后到学部。在 60 年代，可能在以前，他和关锋、林聿时三人，他们在学部写文章，用假名字，在哲学研究杂志上发表叫三（应为“撒”）仁兴。这条线，还有叛徒潘梓年，是潘汉年的哥哥，在国民党反动时期被捕，现已查明，他和国民党勾结，通过国民党 CC 特务，把他放了。因为我们不清楚，他还做了新华日报的编辑，解放后到了学部，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是动摇的态度，关锋亲自去，后是吴传启成为当时学部的头头。四月份他们闻风，派吴传启到上海打听消息，回到北京后，在学部写了第一张大字报。在起草通知过程中，他们企图把吴、潘拉进中央文革，由于江青同志的反对，其他同志不同意，而没有得逞，但王、关、戚、王任重、刘志坚、陈亚丁，在邓小平的推荐下，混进了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小组揪出王、关、戚，并不影响中央文革的大方向和伟大功绩，王、关、戚，也是中央文革自己揪出来的，……在这个问题上发现最早……王力在山东，他本人加入国民党，他妻子是叛徒……王力支持王稼祥的‘三降一灭’、‘三和一少’。关锋利用老婆、小舅子在东北搞‘831’。关锋根子在学部，和军队有联系，原来是萧华的部下。……他老婆在红旗杂志社，完全做‘五一六’的联系，和文化、宣传、学部联络，和林杰联系在一起。关锋企图篡军权，‘抓军内一小撮’他是和王力大喊大叫的。王力在八月七日要夺外交部大权，八月七日的讲话人们取名叫‘王八七讲话’，于是‘五一六’就贴出天安门的两条标语：‘热烈要求姚登山代理外交部长’，‘热烈要求关锋代理总政治部主任’，小字报也登出来了。王力的野心就更大了（康老插话：想当总理），所以他们野心毕露……戚本禹是个野心家，是跑腿的，活动能力很强。他无孔不钻，文化方面他钻的地方最多。江青同志不让他去，他硬要去。他还到煤炭部、化工部，工厂也到了，工厂到二七车辆厂、首

钢。……他的两个儿子（**阎按：当时威的孩子只是八、九岁的小孩**）也不是好人，他能伸就伸，对样板戏也插手，乱改，特别是对交响音乐《沙家浜》和《白毛女》。杨成武那篇文章主席很不满意，大树特树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能登出，但戚本禹一定要登。后来登在第二版上，杨成武还不满意。戚本禹道歉，王力还送像章慰问。……在中央办公厅有彭、陆、杨还有田家英，他完全是跟着田家英走的。田家英有很多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派人收他们的东西，别人的东西都收回来了，就田家英的东西没有收回来。有毛主席的手稿，丢了好多，是戚本禹串通的，第二天田就自杀灭口。戚本禹这个人写东西也是不能写的，过去我们也是受了骗的。《评忠王李秀成》那是根据主席思想，请历史研究所帮他写的，以他的名义发表的。”

在1970年1月24日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时，康生讲话说：“刘少奇司令部垮台了，王、关、戚想代替这个司令部。他们的口号最集中的就是一个‘权’字。‘王八七’讲话，王道明可以当外交部长（江青：主席看过的文件，他们可以在上面写三个揪军内一小撮）。六七年一月戚本禹说：现在24级的干部可以做部长，意思说，老家伙都不成，就是他们这些人掌权，来上台了，军队也不成了，这是他们的基本纲领，戚本禹这一段完全是同主席、同中央方针针锋相对的，他们想把无产阶级的人都赶下去，他们上台。中央办公厅的工作汪东兴同志负责，他们想把汪东兴同志打下去，他们来搞，还要夺机要部门的权。……戚本禹老婆邱良（**阎按：应为“银”**）英勾结了一些机要部门的人来冲机要部门。戚本禹67年1月14日讲话时，特别煽动要夺机要权，这是反革命报告，成了全国机要的行动纲领，煽动群众说‘为什么机要大权不能夺？’他的报告是攻击总理，实际上是攻击毛主席。在66年12月28日，67年1月5日，王力有的讲话，特别攻击总理不能到机要部门串联的指示。戚本禹到机要局煽风点火，在戚本禹的煽动下，他们于1月27日夺了中央机要局的大权。他们掌了28天，夺权以后怎么办？他们一方面联络北京的外交部、联络部、冶金部、交通部、调查部一齐夺权。另一方面，当时全国机要人员大多数都来北京串联，特别是武汉所谓造反派一千多人，就住在中央机要局，这样的地方我们都不能随便去。……他们夺权后，就向全国、全世界发电报，真是反革命。王、关、戚这家伙，要不是留他们做活口供的话，都应该枪毙。就这件事也要判无期徒刑，

他们向全国发电报，对抗总理指示，外交部夺权后向全世界驻外使馆发电报，反对中央，反对总理，反对不准串联的决定。这不就是犯罪吗？他们是造无产阶级的反，对这些家伙我们不是枪毙的话，起码要判他个无期徒刑。”

在同一次接见中，江青讲话说：“当时我们分化王、关分不开，就把戚分开了。但是六七年我差一点叫他们整死，因为我那儿派了一个坐探，我从来不管钥匙，搞走了主席的批件手稿。我那儿成了骡马大会了……”“……后来叫汪东兴同志给派了个机要秘书，来了就被他们支走了，给他放假。后来我发现丢了一箱主席手稿，我没有钥匙，他们把东西都偷光了。小箱子是用剪刀撬开的，里面什么都光了。我采取突然袭击，带现在的秘书、警卫，坐探阎长贵回家，找他们要钥匙，他说这就是对我不利啰。我说：为什么非要对你有利？他们没有枪的后台，没有萧华、杨成武，他们能搞吗？”

在这次会议上，江青再一次说：“……1966年初，对王力这个人我从来不知道，关锋写的文章我从来没看过，戚本禹写的一个‘忠王不忠’我看了。我对四条汉子之一的周扬说：‘这么大的事，你们不报告主席、党中央。’这样才搞出来。66年初春，他们摇身一变，成了中央文革文件起草成员，在上海我和他们有两个斗争。第一个是王、关、戚要求把吴传启、潘梓年、林聿时拉进到中央文革小组，作为党的一个工作人员，我说不了解，没经过中央不能来。……第二个事情，戚本禹有个政治资本，后来知道是狗咬狗，所谓‘八司马’。到四月十六日快起草了，北京搞了真包庇，假批判，他到上海去。他说：‘八司马’是主席知道了的，有问题也要留，我就觉得这个人很温情，坏了要保留，我就打电话给汪东兴说：这样的人不能在中南海工作，后来才知道，他已到了西楼。‘八司马’坏了，他就坏了，后来发现把他弄到记者站，才发现的。（杨成武）我从来没有讲过他的坏话，但我和他斗了几次。一次是他假借抓大的，搞饶漱石专案，利用合法专案，搞了我那么多所谓黑材料，这个专案组并没有戚本禹，他呈阅时也写上戚本禹，我把戚本禹用黑笔画了。……后来我要戚本禹到上海取材料，当时只有我和叶群知道，我说没有，你再搞就是香港，就是台湾了，他就说：我不就成反革命了，我说你自己考虑去吧。戚本禹也利用合法手段，搞了我的专案，就是‘北图事件’，从图书馆、报纸、杂志什么都搞。中央批了，这是反革命事件，第二封信是吴法宪送来的，我一看又是‘北图’，我当时就拍了桌子：‘你是什么东西，

老子不在乎！’这时已不是人民内部矛盾了。当时七、八、九三个月主席外出巡视，林副主席也出去了，只有总理、康老在，他们一下子要端掉我们三个常委，允许不允许呀？（答：不允许。）他们要破坏军队，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因此就这三条，决定把他们捉起来，你们说对不对？（答：对）报告了主席，先抓了两个，戚本禹没捉，差点把我害死。……据我看王力是头头，关锋是第二把手，戚本禹是跑腿的……六七年一、二、三、四月，我就说，你们要和吴传启、潘梓年划清界限，学术归学术，政治归政治，说了多少次，他们就是不作，同志们有物证，捉戚本禹的时候，身上还有给彭真、翦伯赞、吴晗的信的底稿，总理有一份正式的，这是铁证，他是亲笔。……他们大肆整我们，是在 66 年下半年就开始了，他们要夺财政大权，主席说：财政大权可不能叫人家夺。他们是 66 年底、67 年春开始整我们几个人的所谓的黑材料。……6、7、8 月他们要下毒手，首先是危害主席，其次是总理……武汉的问题，陈再道这个人不好，主席回来给我们说，先做军队的工作，再去做群众的工作，当时我们不知道，他们完全封锁。王力回来时，我还到机场欢迎了他，他负了伤，我说请医生护理，他说‘不用，杨代总长给我找了。’在北京市革委会筹备时，主席和我、中央文革决定让富治同志主持，戚本禹想去当第一把手，他有什么资格去？他还想把富治同志弄掉，他想把中央文革架空，还有什么周景芳，据说也是萧华这条线上的，还有李广文，也是山东这条线上的。……67 年春，首先是文艺战士顶着牛，他们直接干，因为打了他们嘛，戚本禹要搞他的样板，我看了，这是‘红毛女’，还搞了‘海港’。……在文艺战线上，他们的黑干将是金敬迈、李英儒、于秀、陆公达、刘巨成、林杰、郑公盾、李广文、赵易亚、唐平铸、胡痴，在开十万人大会时，给贺龙的信写的是‘光临指导’，给我们的信写的是‘勒令到会’。这条线，这些家伙，我给他们划了个线：20 年代是陈独秀，20 年代末是李立三，在党内 30 年代是王明在文艺界的‘四条汉子’。……40 年代到 50 年代发展的‘二流堂’，‘二流堂’就是二流子，二流子就是流氓，他们有党徽、党章，从重庆到北京，五七年定了案。王关戚又要搞这个案了，借此搞总理和我。”

附记：关于所谓戚本禹整江青的黑材料问题，江青和戚本禹在 1967 年 11 月 9 日文艺座谈会上有一场对话。江青：郑公盾这个人真怪，通过他的儿女来操纵。又说：郑公盾不是好人哪，我看了他很多材料，他现在到处控告，都搞到外

国去了！这个人我没见过，是个什么人？戚本禹：（对江青同志）他们说搞了你黑材料……江青：第一我不怕；第二我不相信你搞了我的材料。

本材料提出了一系列需要研究和回答的问题：

- 1、王、关、戚，究竟是谁决定端出来的？是江青还是毛泽东？周恩来在处理王、关、戚问题上起的是什么作用？
 - 2、有什么根据说杨成武是王、关、戚的后台？
 - 3、王、关、戚是刘、邓安插进中央文革的吗？
 - 4、有什么根据说王、关、戚是刘、邓的黑秀才，是刘、邓的第二套班子？
 - 5、王、关、戚的具体“罪恶”究竟是什么？他们怎样“三指向”即如何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如何破坏人民解放军，如何反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
 - 6、有什么根据说戚在王、关被端出后更猖狂了？
 - 7、关、戚是彭真的亲信吗？
 - 8、有什么根据说杨、余、傅、王、关、戚是“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的后台？
 - 9、王力的野心是“想当总理”吗？
 - 10、关锋“企图篡夺军权”吗？
 - 11、戚不能写文章吗？他的“忠王不忠”是历史所的人帮他写的而以他的名义发表的吗？
 - 12、与戚有关的所谓“八司马”事件是“狗咬狗”吗？
 - 13、有什么根据说戚勾结杨成武整江青的黑材料、成立专案组要整死江青？
 - 14、是戚串通田家英，使田家英“自杀灭口”吗？
- 一句话，王、关、戚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

2007 年 9 月

【小资料】

[关于张本](#)

[顾训中](#)

《记忆》总第 43 期在“小资料”栏目中发表了署名“渔歌子”的《文革科技界风云人物张本（部分资料）》。恰好手头有一点零星资料，可稍作补充，并求证于同道。

张本，曾名张玉谋，据说是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一位才女，于抗战前夕参加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抗战期间曾任江苏省委学生运动委员会（简称学委）书记。当时江苏省委留驻上海，领导上海及周边地区的工作。张本负责的是发动学生、教师参加抗战和支援华东新四军方面的工作。1940 年代初华中根据地创办江淮大学时，张本在上海领导学委做了许多动员学生和老师赴根据地的工作。

1941 年 12 月 8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上海租界，中共地下组织难以在上海生存。中共中央指示：中共江苏省委领导机关和工作人员分批向新四军淮南根据地撤退。1942 年底，江苏省委书记刘晓、组织部长王尧山和夫人赵先最后一批撤离，张本亦随之行动。他们在潘汉年的直接掩护和带领下，顺利撤退到了根据地。由于此时敌伪沿路封锁十分严密，为了安全撤退，潘汉年动用了一些曾是中共叛徒、时为汪伪人物的特殊关系。此事后来被称作“镇江事件”，1955 年“潘扬反革命事件”发生时。成了潘汉年通敌的重要罪证之一。文革中张本被江青定为“坏人”并被捕，不知是否与此事有关。

抗战后期到国共内战期间，张本化名张瑜，以川沙中学教师身份为掩护，仍任江苏省委学委书记，在上海领导学生运动。其副书记是后来成为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的吴学谦。

1946 年 2 月，刘晓回上海主持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上海及周边地区地下党工作。1947 年 9 月重新成立了中共上海市委，张承宗任书记，市委委员有张承宗、张祺、张本、陆志仁、钱伯荪，主要负责城市群众运动。张本仍兼任学委书记的工作。1948 年春以后，又增加了马纯古、吴学谦、梅洛、马飞海为市委委员。

1949 年 5 月 25 日上海解放后，于 6 月 5 日正式成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工作委员会，“一二·九运动”领导人之一、原华东局青委书记李昌任



书记，张本任副书记。次年 3 月，李昌调北京任团中央书记，张本接任书记，直至 1952 年 6 月。

（左图：40年代后期的中共上海市委成员在中共执政后合影。前排左起：陆志仁、张本、张承宗、马纯古。）

或许是因为张本在文革期间一度成了“风云人物”并被戴上一些可怕的帽子打倒，关于其出生入死、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精彩经历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记载，也少有其当年同志、同事的回忆。相反，文革中流传的所谓“梅花党”荒唐故事却将其列了进去，被编排成与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同为国民党、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双料特务，让人啼笑皆非。

除了43期《记忆》中披露的张本在文革初期一年间的积极表现外，《共和国元帅——聂荣臻的非常之路》一书中还记载了她在1966年7月30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有7900多人参加的科学口第一次群众大会上的批判发言要点，称她“共讲了19条意见，逐个指名攻击了国家科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公然逐条批判‘科学工作十四条’，批判1962年的广州科学工作会议。张本在发言中还多处影射攻击聂荣臻。如说：有人主张知识分子红的标准，只要一爱国、二拥护社会主义；主张科技界党支部只起保证作用，不能起领导作用；高唱先立后破，反对毛主席的先破后立；主张对科学家搞物质刺激，评学位、学衔、大学生一毕业，实习期满工资就给100元，科学家最高工资可到500元(同当时毛泽东的工资一样高)，主张对科学技术成果进行重奖，等等。”

据对张本稍有了解的老人讲，张本不似曾经经历过地下工作的许多中共党员那般沉稳、内敛，性格中反而有着张扬的一面。或许这是造成她文革悲剧的一个缘由吧？

【专访】

再访作曲家施万春教授

本刊记者

按：本刊2009年第20期的“口述历史”专栏发表了作曲家施万春先生撰写的《她是时代的牺牲品——清查“五一六”给我发妻造成的变化》一文后，一些关心

施先生的读者向本刊致电投函，提出了一些问题。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就这些问题再次采访了施先生。

记：施先生，您的社会影响可不小呀——大作发表之后，一些读者，我估计多半是音乐界的，给我们打电话或写电子信，对您的前夫人董聆十分关心，还有的人想知道您个人今后的打算。您能否就这些问题给这些读者一个答复？

施：非常感谢，你们很负责任。我先谈谈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吧。清查“五一六”运动在我们这一代，是一个永远抹不去的历史记忆，我的前妻董聆和许许多多被打成了“五一六”分子的人一样，成为这次运动的牺牲品，身心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以至造成了终身的扭曲。这是“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摧残革命群众的又一铁证。《记忆》约我写“五一六”方面的文章，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曾经与我患难与共的前妻，想到她受到的迫害。我请贵刊发表这篇文章，就是想提醒后代不要忘记过去。只有了解过去，才会珍惜现在和未来。

记：董聆有多大年纪？现在生活得怎样？

施：董聆现年已近七旬，在日本已成立了新的家庭，生活稳定，健康状况良好，与新的老伴十分和睦。

记：您现在对董聆怎么看？

施：董聆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其一，她对自己和亲人要求非常严格，绝不做损人利己的事情。这一点从她对儿女的要求上就可以看出来。其二，她办事讲原则，不符合原则的事情，她绝不去做。其三，她办事认真负责，不管是公事，还是私事，只要她答应了，她都会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去做。其四，她对人对人很忠诚，对爱情很专一。总之，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尽管在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她受了很多的苦，但是她仍旧坚守着这些优秀的品质。想到她的优秀品质和我们同甘共苦的经历，我还是很怀念她的。每当我想到她赴日的最初十几年，抚养两个孩子的艰难，想到由于我们的离异，给孩子们带来的生活上的困苦，感情上的压抑和心灵上的扭曲，我的内心深处都会感到阵阵酸楚和疼痛。这些年来，我的痛苦埋藏在心底。值得庆幸的是，在他们妈妈的呵护教育下，一对儿女健康地长大成人，我的前妻也有了新老伴。孩子们对我非常好，还经常回国看我……这

样，苦苦折磨我的负疚感，才有所缓解。

记：您个人生活有什么打算？不想成立一个新家吗？

施：我们离异后，我一直都未曾考虑重新成立家庭的问题，原因很简单，我觉得我们的离异是对不起孩子的，想到在孩子们成长的最重要的阶段，由于两个国度的经济差异，尽管我想，但并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两个孩子，一个七岁，一个十四岁，都是他们妈妈拉扯大的，又深感对不起他们的妈妈……现在孩子们虽然都加入了日本籍，但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国仍然是他们的祖国，北京的家仍然是他们的家。为了在心理上让他们不失掉祖国、不失掉家的感觉，我绝意不再结婚。离婚后的二十五年来，我也陆续结交过几个异性朋友，她们似乎都能理解这一点。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仍然是“单身贵族”。现在人老了，也失去了年青人的浪漫和激情，身边有人照顾就行了。我只想多活几年，多写一点作品，多教几个学生，多发挥一点余热，为社会多做点贡献而已。

记：好的，谢谢。最后，您是否希望通过这个媒介，对您的前妻说几句话？

施：好，谢谢。董聆你好，我和我的亲属们都很想念你，我希望你好好保重身体，把以前的不愉快统统忘掉，好好地安度晚年。我特别欢迎你和你的老伴儿一起到中国来玩，到我延庆的四合院住上一阵，呼吸呼吸中国农村的新鲜空气，吃吃中国风味的农家饭。我们虽然做不成夫妻，但仍旧可以成为好朋友。我建议把我们的孩子和你老伴的孩子也一起叫过来，组成一个临时的大家庭，把失去多年的天伦之乐，重新找回来！

【文摘】

受害者同时是加害者

孙传钊

极权主义体制的受害者同时是加害者问题，恰恰是人们往往要回避的又难以回避的问题，也是揭露当年黄苗子告密和冯亦代卧底文章在网络上引发人们争议的要因。国内也出现有些学者介绍欧美这类“见证文学”及其研究，如徐贲的《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王炎的《奥斯维辛之后：犹太

大屠杀记忆的影像生产》。这些回忆录似的“见证文学”和影像作品最大的价值，不是在于文学性，而是其道德意义：人类能辨认苦难存在与根源，共同担负起伦理责任，分担他者苦难，具有维系社会正义和团结作用。这类人类灾难见证（如对纳粹的大屠杀思考）能对普通公民道德判断和政治行动产生积极作用。

然而，一个社会完全失去民主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个人伦理自律——民主社会存在的第一条件的同时，建立在个人自律基础上的公共领域内的自律和约束也荡然无剩了，当政者可以随意解释或改变任何法规，任何法定规则，都有无数例外。于是造成了人格特征都是“两重化”：认知与行为实践分离。于是，往往受害者又是这个体制的维护者，甚至在另一些公共生活领域充当加害者。这种不正派的社会还因此能够恶性循环长久延续的原因。坚持道德自律的人、拒绝“两重化”的公民就会被作为不顺应体制的“敌人”得到惩罚，几近绝迹。社会政治生活中不仅“告密”、“检举”盛行，由于告密能获得升迁和利益，人们都以他人的苦难作为自己的愉悦。因为人对死亡的恐怖胜于对自由的渴望，包括知识分子在内，人们都失去自律的伦理规则。在《独裁体制下个人责任》一文中，阿伦特说：这种丧失道德自律的人们，不仅是感觉到暴力的威胁才屈服、追随纳粹运动，不少人实际是怕赶不上新时代起点“历史的步伐”主动地参与。所以，诱惑与威胁一样，同样能使人丧失道德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在法庭上，因为自己受到威胁或利诱才行恶的借口只能作为威胁、利诱者犯罪的证言，但是这不能成为自己屈服的道德上正当性的理由。那些拒绝在公共领域与纳粹配合的人们，是仅有的还能用自己头脑依据原先的善恶标准做出道德判断的人们，他们的良心不会自动地随波逐流地转换。这些坚持习惯的道德准则的人们，也就是带有疑问自己，不愿意自己与自己（良心）过不去、下决断的人们。（日文版《责任と判断》，55页）托多罗夫在《面临极端》、《失去家园的人》等著作中也指出，在这种社会体制下，并非人人都犯有同样程度的恶行，甚至面临极端困境时，能够坚持内在良知、表现出令人感到意外的英雄壮举的却可能是默默无闻的普通小人物。因此，建立在个人良知上的真实记忆，对于国家、民族身份认同的集体记忆来说，是弥足珍贵的。

另外，托多罗夫在书中提出关于历史追忆中一些应该注意问题，我想这些对我国公共知识分子进行历史追忆时也是值得注意的，这里略陈三点：其一，在记

忆、寻求 20 世纪发生极端邪恶的悲惨事件真相时，与考察人们逆来顺受行为相比，更要关注、追忆那些与恶行积极斗争抵抗者、人类生存救济者的高尚、英雄行为。这些人物和行为具有道德号召力。其二，我们要警惕后学（后现代和后殖民理论）盛行的今天，道德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对记忆主体的影响。托多罗夫赞赏雷蒙·阿隆在价值观上调和了列奥·斯特劳斯绝对论与马克思·韦伯的相对论之间的对立，也认为即使因为文化的多元，即使不存在绝对真理，但是人类也有超越历史的、普遍的、共同的价值标准。其三，记忆，特别是记忆民族苦难史，有着个人认同自己族群、民族归属——身份同一性的功能，这本也无可非议。但是，问题是其激发的民族主义，往往出自神圣化的记忆，对同一归属的人的苦难、自身的不幸特别关注，无视其它族群、民族的苦难史。但是，如果能把这种关注迁移到其他族群、民族，那么。问题是功能认同的迁移。就更能体现记忆本身正义的价值。比如，日本民族与纪念广岛原子弹悲剧同样，重视南京大屠杀；美国犹太人在不忘纳粹屠杀的同时，如果也关注非洲裔美国人的历史，才更具有和平意义的象征。这也是因为人类也有超越历史的、普遍的、共同的价值标准。

总之，阿伦特、托多罗夫在思考历史记忆时，都不忘继承从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到康德的伦理思想之传统——试图解决个体自由与义务化的主体规约矛盾，都认识到即使在民主社会里，道德价值观依然是与我们当下的记忆和历史研究——历史教训、以史为鉴不能分割的一环。

摘自作者《记忆的歧义》一文最后一节。全文共约 10900 字）。

【编读往来】

一、唐金鹤答刘双的质问：

刘双先生：

读了您的质问，我感到羞愧，无地自容。

一直到四十年后的今天，我都清楚地记得，1968 年 7 月 27 日的那一天上午，我从 9003 大楼的西面奔向西主楼，一路上，我高兴极了，我的心里乐开了花。当时我什么也不明白，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所看到那个

阵势，使我明白，清华园里的武斗结束了，老四有救了，清华园里以后不会再有人死在枪口底下了。我记下了我身边一个个倒下的同学，但是我却忘记了那一天为了解救我们，一个个倒下去的工人师傅。

现在，我们不去谈这件事的真相如何，不谈这些工人师傅的死应该由谁来负责，就谈我们自己。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了清华园，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我们的大恩人。为了制止老团和老四两派之间的武斗，恩人们的鲜血洒在了我们清华园的土地上。我是一个直接得益者，老四是得益者。而我们却没有记住他们。这样做人，正如刘双先生所说：良心何在？我确实没有守护住做人的底线。我在这方面的过失实在是太不应该了，现在我感到很亏对那些在危难的时候解救了我们的工人师傅。我不断地叹息：“这么没良心的人，管他干什么呀？他们爱打就让他们打去呗！看来，七二七中死难的工人师傅要死不瞑目了，”沉重的心情使我多日彻夜难眠，使我陷入深深的自责中。

在这里，我们要感谢刘双先生。我们要多谢刘双先生的质问，这些质问使我又可以少犯错误。我们大家都非常感谢您！

《倒下的英才》的再版工作已经开始。我们把刘双先生的质问看作是对我们的鞭策，成了我们前进的动力。我们现在就开始查找这方面的数据，尽管在这方面的数据我们几乎没有，但是，有着大家的支持和帮助，我们一定可以尽最大可能，最好地完成这项历史任务。

唐金鹤上

2010年3月11日

二、杜钧福订正刘双一个说法：

贵刊总 43 期的“编读往来”刊登了刘双对《倒下的英才》作者的质询。刘双在文中提到“毛泽东没有追究团派杀人的法律责任，文革后，也没有被追究。”此

说不确。1982 年审蒯大富时的起诉书和 1983 年的判决书，所列主要罪状中都有他在 1968 年 7 月 27 日命令部下向工宣队开枪，“致使宣传队员王松林、张旭涛、潘志宏、韩忠现、李文元惨遭杀害，七百三十一人受伤。”

三、张杰质疑杨国宇日记中提到的北京卫戍区司令：

杨国宇日记中提到：1967 年 10 月，卫戍区司令吴忠曾来七机部。记得那时的北京卫戍区司令是傅崇碧（68 年 3 月 24 日被打倒，即著名的“杨余傅事件”）。吴忠尚为副司令。

（编者回复：杨国宇日记中所写的“司令”，应为日常称呼中将副职的副字省略掉的习惯。本刊未加注说明，特此致歉。）

四、戴为伟谈读后感：

42、43 期《记忆》都细细读过。如果没有了《记忆》这类民间刊物登载的这些真实细节，文革渐渐就会成为一个空虚的名词，直至被遗忘。而文革还不仅仅是空虚的名词这么简单，它更有点像天文学意义上的黑洞。它不光吞噬了那个时代和以往的道德，更在继续扭曲和吞噬着未来的文明希望。这一点，从当下社会的混乱可见一斑。

42 期“尸长”那篇，使我至今不能释怀。“尸长”是真正令我敬慕的勇士，他不仅正视时代的疮疤，更直视自己身上的血迹和腐肉，为那个时代和他自己刮骨疗毒。“尸长”是少有的真英雄！

当一些人的聪明、野心、智慧和欲望只有政治这一个发泄渠道时，文革成了他们，也毁灭了他们。

五、赵晓玲称赞华新民的文章：

华新民文章好。钱学森逝世时，宣传纪念规格高，引来对钱的批评声浪也高，感觉动辄做道德上的批评，有点简单化，华文就很显出份量了。政治运动中保护一部分人，是一贯的。上面有明文规定，对待技术干部与行政干部是两样的。另在文革前的一些运动中，总是要找个“代表人物”中的左派来做样板。研究这些样板很有意思。表面尊重，有地位，实际上被控制得很可怜的。相信钱的档案里有很多被汇报的东西，时时被监督被汇报的，要不怎么会那样快把他隔离起来？一个大科学家，也如马戏团的动物一样在皮鞭威胁与食物引诱下活得那样卑微。这就是知识分子政策呀，这是有效果的。我想，在恐惧中出于自保来表态，在二桃杀三士的政策中去咬同伴，各地大大小小的钱学森多了！

六、胡泊纠上期之错：

上期《记忆》中，《七机部文革军管日记》一文有两处可议：

1968.5.16

薛【薛】长勇

1968.6.13

我无根。(原文如此)【原意是否为：我无根据？】

(编者：这两处都系误植，应改如上。编者未能校出。向读者致歉，向胡泊致谢。)